

明清時期澳門三軌並行課程傳統的形成及其影響

郭曉明*

摘要 學校教育及其課程與澳門文化之間，歷史上一直存在一種互為包含和相互推動的關係。澳門最早的知名教育機構——聖保祿學院創辦於十六世紀，以聖保祿學院、聖若瑟修院和馬禮遜學堂為代表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學校的課程，是澳門課程傳統中最早、最有影響的一支，它重視宗教、拉丁文、葡文、中文和英文，同時引入科學、體育和藝術課程，對澳門文化的構成及其演化帶來重要影響；十九世紀末華人的蒙學教育及其課程的影響，尤其是以陳子褒蒙學書塾為代表，推動了以蒙學教育為代表的傳統儒家教育向現代教育的轉型；而葡文學校及官立學校在十九世紀末形成以重視葡語和葡國文化為特點的課程傳統。此“三軌”課程來到澳門，時間先後有別，影響大小不一，但於十九世紀中晚期齊聚澳門之時，形成了澳門“三軌並行”的課程傳統，三者交相輝映，不僅共同構成澳門文化的不同面向，也成為澳門文化血脈演化的內在動力。

關鍵詞 澳門；明清時期；中小學課程；課程傳統；文化演化

澳門居民始終以華人為主，十六世紀中葉以後歐洲商旅、傳教士帶來西方文化，故澳門文化具有“雙源惠澤”的特點，這給教育以極大影響，“世界兩大文明的匯聚，雙元文化的潤澤，形成了澳門獨特的教育景觀。”¹從另一方面看，澳門幾百年來“多元並存，各美其美”文化風貌的形成與發展，是否與“雙源惠澤”的教育系統密切相關呢？

在十六世紀中葉至清末這三百餘年裡，葡人與華人各自因應其文化及現實生活謀生的需求，先後興辦了各式學校，雙軌平衡發展四百多年。²就其課程而言，東、西方各有其淵源和傳統：華人學校的根基是中華文化及其教育傳統，教會學校和早期官立學校的文化母體則是西方文化、西方的教育傳統以及特定時期的教育理念。澳門早期的學校課程主要有三大來源：教會學校（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的課程、華人

蒙學課程以及葡文與官立學校的課程。他們共同負起興學的責任，同時也依其文化教導子弟，成就各自的傳統。

一、教會學校的課程傳統

自從1557年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門的居留權後，西方的教育就隨着傳教士的到來而傳入澳門。西方文化影響澳門乃至東亞的重要途徑之一是傳教，而澳門不僅是我國對外開放的第一個貿易港口，而且是天主教在中國乃至東亞最早的傳教基地和樞紐。³基督教在澳門以至中國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始創期（1555-1722年）、禁教期（1723-約1845年）、復甦及發展期（約1846-現在）三個階段。相應地，有學者將基督教在粵港澳所舉辦的教會教育，亦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552-1806年，處於基督教向中國第三次傳播⁴時期，是明清之際早期天主教教育階段。……聖保祿學院和聖若瑟修院是這一時期最主要的兩所教會學校。

*郭曉明：教育學博士，現任澳門特區政府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顧問，兼任澳門城市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第二階段，1807-1842年，處於“禁教”政策下新教向中國傳播的初期，是鴉片戰爭前早期新教教會教育階段。……這一階段所要重點分析與探討的兩所教會學校是英華書院和馬禮遜學校。

第三階段，1842-1911年，大致屬於晚清時期，處於“條約政策”的保護下，……是晚清的教會教育階段。⁵

故對於澳門早期教會學校的課程，有代表性的學校有耶穌會的“讀寫學校”、聖保祿學院、聖若瑟修院和馬禮遜學校。

（一）耶穌會“讀寫學校”的課程

基督教教育在歐洲中世紀教育中幾乎佔據了支配的地位，而耶穌會在宗教改革以後的基督教教育中又是一支最為重要的、有世界範圍影響的力量。澳門早期的教會教育幾乎均與耶穌會有關。耶穌會（拉丁語：Societas Iesu，簡寫為S.J.或S.I.）是天主教會重要的男修會之一，1534年8月15日由依納爵·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和方濟各·沙勿略（S. Francisco Xavier）等人成立於巴黎，1540年教皇保祿三世以詔令予以承認。耶穌會最大的特色是特別注意耶穌會士的教育，其標準化教育基本上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即讀寫教育，多數人是從六至七歲開始，也就是在耶穌會內提供拉丁語和希臘語（較小程度上）的教育，在14至15歲完成。

然後開始第二階段的學習，即初修階段，這一階段包括兩年的人文課程和三年的哲學課程，在20歲左右完成。完成這一階段學習的學生可以稱為修士。

第三階段，稱為神學院階段，神學學習一共為四年，這四年的最初兩年學習道德神學和決疑論，之後兩年學習思辨神

學。完成這一階段學習的修士即可晉鐸，稱為神父。⁶

耶穌會與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的拓展如影隨形，殖民地拓展到哪裡，他們的各種學院和學校就辦到哪裡，由此幾乎壟斷了海外殖民地的教育。1576年1月23日，羅馬教廷頒佈諭旨成立澳門教區。教會在澳門的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神職人員積極從事教育活動。1572年，耶穌會在澳門創辦“讀寫學校”（Escola de Ler e Escrever），這是澳門首間教育機構。據澳門檔案館提供的資料，該校建於1571年，由皮雷斯（Peres）神父擔任校長，⁷設在“天主之母的小教堂附近”，1572年舉辦開學典禮。⁸雖到1594年聖保祿學院成立時，該校與之合併而成為其四個學部之一，但此前它已獨立運作22載，且此後一直存在於聖保祿學院之中。據記載，該校1577年有“150名孩童來上學”，1592年“學校裡有200人左右”，⁹1594年“在那裡就讀的孩子超過250人”。以當時澳門的人口計算，學校的規模已相當大，應無可與之比肩者。

由於該校的定位是兒童啟蒙教育，招收葡萄牙人的子弟和澳門基督徒的子女，因而其課程與聖保祿學院的神學課程大有不同。據葡萄牙學者研究稱，該校開辦初期教學內容的情形是：

1571年剛開辦時僅教孩子們閱讀和寫字。到了1584年，隨着教學的發展，尤其是更多的傳教士從歐洲來澳門，其中不乏數學家與音樂專才，因而公學教授內容也發生了變化，首先增加了算術，接着又增加了教唱歌的音樂課和文法課。¹⁰

1594年10月28日的第一份《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則稱：

至今，我們有四個學部。第一是教授閱讀寫字的兒童學部……除供兒童學習的閱讀課、書寫課、文法課、人文課和道

澳門研究

德課外，僅有兩名由中國教區負責的神父在私下學習神學專業……¹¹

另外，根據 1654 年《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的描述，讀寫學校：

除教授良好的生活習慣外，還教孩子們讀書、寫字，協助做彌撒、唱歌、算數以及進行有關教義的問答。孩子們對有關教理的提問，答案大都熟記，因此能對答如流。為了練習所學內容，常常帶小學生去教堂聽彌撒，老師陪伴左右。¹²

從以上不同時期的記載可見，讀寫學校的課程主要包括：閱讀、書寫、文法、算術、音樂、道德，至於《年報》中提到的“人文課”，應該就是音樂等藝術課程；而“道德課”，按照 1597 年 10 月《視察員神父范禮安為該澳門神學院授業給予的命令》，應屬於其中第四章所述的“教養科目”，主要是抄寫及討論《聖經》，學習宗教禮儀，參與祈禱等宗教活動。¹³

這裡的一個問題是，兒童用何種語言“閱讀和寫字”？由於耶穌會辦教育主要是為了傳教，而當時的宗教經典和傳教活動主要依靠拉丁文，再根據《視察員神父范禮安為該澳門神學院授業給予的命令》等文獻，有學者認為：“拉丁語課程，這應該是讀寫學校孩子們必修的課程”¹⁴。前述《授業命令》規定，“拉丁文課上午為兩個半小時（七時至九時半），下午為兩個小時（十五時至十七時）。星期六下午為例外，只有一個半小時。11 月 8 日至聖周星期三，……下午課十四時半開始。”¹⁵

另一個問題是，“讀寫學校”有沒有開設葡語，尤其是有沒有面向本地兒童的葡語課程？按照湯開建的見解，“十八世紀中葉以前，葡萄牙語已成為中國南部口岸商業通用語”。¹⁶許多記載也說明，教會除了使用拉丁語外，也使用葡語。可見，無論是商業、宗教，還是兒童的成長上，都需要葡語教育。考慮到天主教是葡萄牙的國教，葡籍居民都是天主教徒，而

“讀寫學校”自始至終都是為天主教徒孩子的教育而設，因而其讀寫課程的內容除了拉丁文外，應該還有葡文。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不論在辦學理念還是學校運作上，“讀寫學校”並非此後近現代興起的普及化的小學教育。在課程和辦學理念上，拉丁語的讀寫和音樂教育，都是服務於宗教的需要，而非兒童的全人發展。

（二）聖保祿學院的課程

聖保祿學院（Colégio de São Paulo）創立於 1594 年，以“讀寫學校”為基礎升格而來，至 1762 年關閉，前後延續 178 年，是耶穌會在澳門舉辦的影響最大的學校。¹⁷該校被稱為東方最早的大學，不僅對澳門後來的教育及其他學校有深遠影響，而且在中國教育史上也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據記載，學校剛開辦的時候學生人數並不多，在 1635 年前，每年在校的學生最多不超過 59 人，教師最多時只有 8 人，學院總人數最多為 92 人。¹⁸

對於聖保祿學院所開設的課程，學者曾有不同的觀點。黃啟臣認為：“學院根據在中國傳教的需要設計課程，計有中文、拉丁文、哲學、神學、數學、天文學、物理、醫學、音樂、修辭學等。其中中文課程是最重要的必修課，人人要學、學時最多。”¹⁹劉羨冰則認為，聖保祿學院的課程既保留了耶穌會已經形成的課程結構，又借鑑了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的規章制度；課程以拉丁文為基礎，以西方古典學術知識為主體，以神學為皇冠，以培養分派各地的傳教士為根本目的。課程分為“人文科：漢語、拉丁語、修辭學、音樂等；哲學科：哲學、神學；自然科：數學、天文曆學、物理學、醫藥學等”。²⁰她還認為，課程中有漢語一科，“課時最多的也是漢語”。李向玉在《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一書中並不同意“人人必學中文、中文學時最多”的提法。²¹

我們認為，澳門聖保祿學院的課程應該秉承了耶穌會的辦學傳統，在一百多年的辦學歷史中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早期的課程應該起奠基性的作用。同時，該校設有不同的“部”，其課程有所不同。1594年10月28日的《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就稱：

至今，我們有四個學部。第一是教授閱讀寫字的兒童學部；第二是文法學部；第三是人文學部，這是今年才增設的；第四是倫理神學部。而明年會開辦藝術課程……由於范禮安神父的到來，認為有必要再增添其他課程和其他科學專業。……除供兒童學習的閱讀課、書寫課、文法課、人文課和道德課外，僅有兩名由中國教區負責的神父在私下學習神學專業，而人們期待有更多人來此攻讀這一專業。²²

湯開建研究考證後也認為：

澳門聖保祿學院除了作為主體機構的神學院（Colégio）外，還有附屬於該學院的讀寫學校（即前所言的小學部）及神學校（Seminário），對於傳教區而言，神學院是為了培養神父的地方，而神學校則相當於初修院，是專門培養修士的機構。²³

所以，我們同意葡萄牙學者多明戈斯·馬烏里西奧·戈麥斯·多斯·桑托斯（Domingos Mauricio Gomes dos Santos）的觀點，在聖保祿學院的課程中，可以分為“初級課程”和“高級課程”²⁴。前者只是供兒童和修士學習的，例如閱讀課、書寫課、文法課、人文課和道德課，主要是供未成年的兒童學習的，其中，拉丁文是基礎；為期三年、以教養為主要目的、以哲學為主要內容的“藝術課程”，也屬於此範疇。而神學院最核心的、用於培養神父的課程是神學專業課程，包括倫理神學和思辨神學，可授予學位，屬於高級課程。當然，聖保祿學院不是一所完全的宗教大學，它“沒有設置天主教法典的課程”；它更不是一所科英布拉大

學那類開設有全部課程的常規大學，“未設置民法和醫學專業”。²⁵

至於中文課程，湯開建教授在全面分析《聖保祿學院年報》和《耶穌會日本教區年報》後，特別指出：

澳門聖保祿學院雖然也曾開設中文課程，但並非如國內學者所言中文為聖保祿學院學生的必修課。我們見到澳門聖保祿學院最早開設中文課程的時間為1620年9月，直到1635年，十餘年間共開設過兩次。我們實際見到的最早在澳門聖保祿學院學習中文者，當為1610年後來到澳門的艾儒略、史惟貞、畢方濟三位神父……可見聖保祿學院中文課程的開設均應是實際工作的需要而並非設課程，更非該學院學生的必修課。²⁶

雖然耶穌會1587年正式確定了一項決策——“所有的傳教士都要學習語言”²⁷，但這並不意味着聖保祿學院也將中文作為學生的必修課。1593年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提出建立聖保祿學院的建議，目的是培訓赴日本的傳教士。據考證，在聖保祿學院開辦的早期（1594-1614年），入該院學習的日本學生共有14人，1614年11月聖保祿學院專門設立日本人神學校；聖保祿學院還曾經開辦專門的日語班。²⁸可見，拉丁文在在聖保祿學院是必修課程；中文和日語只是針對部分有必要學習者才開設的。當然，學院的傳教士後來因難以進入日本而被改派中國內地者日多，²⁹故學習中文的人數也就越多一些。特別是1710年（清朝康熙四十九年），康熙明令新來的西方傳教士在澳門學習中文，³⁰澳門後來成為來華傳教士進入中國前學習中文的基地。

（三）聖若瑟修院的課程

聖若瑟修院（Seminário de São José）是耶穌會在澳門創辦的另一所重要的教會學

澳門研究

校，附屬於日本副省的神學院，由於中國傳教區於1623年脫離日本教區的管轄成為獨立的副省，聖若瑟修院就是專為中國教區而創建的神學院，1728年2月23日設立，澳門人又稱為“三巴仔學院”。聖若瑟修院雖然沒有聖保祿學院有名，但它在澳門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葉農教授評論說：

它對十九世紀澳門教育的發展，為澳門培養人材，是聖保祿學院所不能比擬的。它是澳門十九世紀唯一的一所高等學府，有多層次辦學體系，其培養人材之多，專業面之廣，對澳門教育發展史影響之巨大，近代史上沒有一所學校能出其右。

……聖若瑟修院開啟了澳門世俗教育的歷史，為培養澳門政界和商賈人才做出了積極貢獻；播下了科技教育的種子，對促進中國科技教育的發展起了重要的啟蒙作用。³¹

由於澳門耶穌會在歷史上數度遭葡政府的驅逐，故聖若瑟修院的發展十分曲折。1762年，耶穌會士第一次遭驅逐，聖若瑟修院與聖保祿學院一起被關閉，神父和修士被逮捕押送至葡國。故從1728年至1762年，是耶穌會管理的初創及發展期，此後中斷了很長一段時間，直至1784年至1856年交由遣使會復辦，重振輝煌，在72年裡培養了一大批人才。據瑞典學者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介紹：

1815年，有八名年輕的中國人，兩名馬來人，16名在澳門出生的男童，住在該修院。1831年，修院中有七名年輕的中國人，兩名來自馬尼拉的男童，其父為葡萄牙人，以及13名在澳門出生的學生。³²

關於聖若瑟修院的課程，龍思泰曾說：

教師講解葡文和拉丁文語法、算術、修辭學、哲學、神學等等。很多居民的孩

子進入該校，儘管其中很少有人會成為神甫。這裡有時還教中文、英文和法文。每月能為其子女支付一小筆膳宿費用的父母，將自己的孩子送進修院，學習真正的葡萄牙語，有時還能體會到心靈的升華。³³

然而，到1834年，由於澳門總督宣佈非葡籍傳教士必須離開澳門，遣使會會長於1845年被迫宣佈解散澳門聖若瑟神學院，至四十年代末，學院幾乎已名存實亡。

不過到1856年，葡萄牙國王頒佈法令，要求重建海外神學院，聖若瑟修院於是在1862年恢復招生。由於耶穌會的教師重新回到修院，學生人數大增：

住院學生發展到41人，全領獎學金，院外學生則超過150人，總共超過200人，1864年為264人，1870年為377人。設置的課程有基礎語文、葡文、拉丁文、法文、英文、基礎數學、歷史、地理、倫理哲學、物理，還包括一些音樂等輔助課程。³⁴

不僅如此，由於里斯本政府派來的耶穌會神父、意大利人羅迪納的特殊才能和個人魅力，他不僅出版《上帝的神性》和《哲學概要》兩本書，而且還在學院組織了一支30人的樂隊，購買樂器和服裝；增設了物理、化學實驗室，加強了物理和化學教育。

1870年，葡萄牙政府再次驅逐澳門的非葡籍教師，聖若瑟修院的非葡籍教師於1871年被迫離開，新院長力圖將學院“辦成一所完全世俗化的學校”，除一位神父外，教師全部聘用世俗教師，“政府派政府教師在院任教，修院便差不多變成了一座市立中學”。但由於管理鬆懈，教師資歷不足，“砍掉了地理、歷史和商業簿記課程”，“語言和數學學習成績欠佳”，學生的知識和道德水準日低，得不到澳門居民的認可，1881年學生的人數銳減至68

人。直到 1893 年，耶穌會士重回修院主持院務，學校才迎來又一段時間的輝煌。1925 年，修院有學生 533 名，其中修生 62 名。1930 年，學生達四百六十多人，包括修生 123 名。³⁵

一直以來，聖若瑟修院有“大修院”和“小修院”之分。“大修院”的學生為“修生”，專門培養宗教人才；“小修院”則以世俗教育為主，相當於中小學。林家駿神父說，“澳門聖若瑟大修院自創辦以還，附設葡文書院”³⁶，1938 年“教廷訓令全球教會修院不得兼收外讀生，修院迫於關閉葡文班（俗稱聖若瑟書院）。華文班則脫離修院獨立，改名聖若瑟中學”，修院自此只供培養神職人員之用。此處的“葡文書院”和“華文班”實質都屬於“小修院”。

在課程方面，“大修院”以高階的宗教課程為主，多位聖若瑟修院的畢業生後來成為了主教³⁷，著名的歷史學家文德泉神父，1924 年由葡萄牙來澳門後也就讀於聖若瑟大修院。“小修院”的課程相當於基礎教育，高天予神父 1931 年 13 歲時入讀聖若瑟“小修院”。據他回憶，“小修院通常的程度是等於中學的初中、高中。除了初中、高中的課程，中國籍的學生還要學拉丁文和葡萄牙文。而葡國籍的學員則需要學法文和中文。葡國籍學員小學四年、中學五年；中國籍的學員小學是六年，中學也是六年。”，“完成了中學課程後，就升讀神哲學（課程）。首先讀哲學兩年，……當時要求兩年哲學和四年神學。神哲學等於大學的課程，即是大修院的課程。”哲學和神學是用拉丁文來學的；小修院還可選修中國哲學。³⁸另據記載，澳門知名人士崔德祺十歲（1922 年）進入聖若瑟神學院學習，其傳記說：

崔德祺於 1922 年進入聖若瑟神學院學習，包括學習葡語。這時的神學院已有相當的聲望，吸引的學生不僅來自澳門，也有來自香港的想學習法語和拉丁語的學生。……令他感到自豪的是他從未忘記在神學院五年學習時間裡所學到的法語。……在神學院的五年時間，除了正規

課程的學習外，對崔德祺性格的形成有着明顯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他對音樂的愛好上。神學院通過合唱和樂理課，對他進行了嚴格認真的培養。此外，他還學習了一種樂器：薩克斯風。³⁹

可見，1922 年前後聖若瑟小修院的課程包括葡語、法語，甚至還有拉丁語。同時，“音樂是聖若瑟修院的必修科”⁴⁰，課外活動可能還有合唱、樂理和樂器。事實上，“聖若瑟修院自十八世紀中期以後成為澳門天主教音樂的創作園地。而聖若瑟修院的師資，促進了澳門的音樂基礎教育，培養出眾多的音樂人才。”⁴¹

由是觀之，聖若瑟修院除設置神學課程外，最大特點是高度重視世俗課程和世俗人才的培養，1762 年聖保祿學院被關閉後，聖若瑟修院在這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聖若瑟修院在開設拉丁語的同時，重視葡文、法文和英文，是澳門將這幾種現代語言明確列為必修課的最早的教育機構。同時也開設中文；⁴²1860 年，修院還曾開設“漢語課程學校”⁴³。其二，重視科技教育，是澳門引入物理、化學、地理，並開設實驗室最早的學校之一。其三，重視航海和商業發展的需要。澳門自開埠以來就以商業和航海立市，聖若瑟修院與澳門的市政機構保持密切聯繫，在十九世紀中葉還開設航海技術課程，1862 年政府頒佈條例在院內設立“航海學校”（Escola de Pilotagem），以取代原有的“皇家領水員學校”，課程為期兩年。1881 年 12 月 22 日，重建後的修院“仍保留航海和商業課程”。⁴⁴這兩個課程都是澳門最早的職業技術教育課程之一。

（四）馬禮遜學校的課程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是英國“倫敦會”派往中國的傳教士，1807 年來到澳門。自此，基督新教開始傳入中國，美國的長老會等新教團體亦先後進入澳門。1834 年馬禮遜在廣州去世後，“馬禮遜教育會”在 1836 年於澳門成立。該會於 1839 年在澳門設立馬禮遜

澳門研究

學校 (Morrison School)，耶魯大學畢業生、美國人布朗 (Samuel Robbins Brown) 任校長。該校於 1842 年 11 月遷往香港，1850 年停辦。值得一提的是，1988 年馬禮遜紀念學校曾在澳門復校。該校附屬於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的澳門志道堂，當時的課程“緊接‘香港學校課程’”，尤其重視學生的“身、心、靈及知識”的發展。⁴⁵

馬禮遜學校雖然前後僅辦了十年，招生人數也一直不多，⁴⁶ 但該校是基督教新教在澳門辦的第一所正式的西式學堂，也可以說是中國的第一所西式學堂，影響十分深遠。首先，在辦學宗旨上，馬禮遜教育會在籌辦期間的第二份通告中就明確指出：

正如中國語言文字的知識給外國人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對英語的掌握也將為這個帝國的人民帶來同樣的或更大的好處。……“馬禮遜教育會”……的目的，是在中國建立或資助一些學校，以教育本地的青年，使他們在掌握本國語言的同時，能夠閱讀和書寫英文；並能借助這一工具，掌握西方各種門類的知識。在這些學校，將要求閱讀《聖經》和基督教書籍。⁴⁷

同時，在辦學形式上，1838 年馬禮遜教育會的第二年度報告就說，在其所資助的學校，“孩子們根據其年齡，被分成了三個班級”⁴⁸。所以，與聖保祿學院和早期的聖若瑟修院不同，馬禮遜學校在中國教育史上應該是第一個引入西方近代班級授課制的學校；而在國內，直到 1860 年代清政府籌辦的京師同文館，才開始嘗試。在澳門，這種新的教學組織形式對十九世紀末期興起的新式教會學校，以及華人舉辦的新式學堂，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此後，嚴格按照學生的年齡和知識程度分班成為一種普遍的做法，是澳門教育走向現代的重要標誌。

而在課程和教材方面，馬禮遜學校的安排是建基於他們對中國教育的廣泛調查和思考。布朗認為，“一個學堂忽略了對人本質和道德的教育，那麼這個學堂就沒有建立和維持的意義了”。在觀察和反思了中國的教育和學生的精神面貌後，他認為：

這種種所謂的“古老的教育體制”所培養的僅僅是一些唯命是從的忠於國家的臣子。該教育體制的目的並不是針對人的本性來充分教導讓人們能夠自由發展。學校的學習僅僅局限在一個統一的單一模式。自然科學被忽略了，人們自發質疑的精神受到壓制。……馬禮遜教育會將會帶頭替換掉這種古老陳舊的教育體制，……幫助人們了解自己的本質，讓知識和美德的果實在中華健壯地成長。……⁴⁹

所以，馬禮遜學校重視中、英雙語教學，而且除中文外，其他科目全部以英文為教學語言。他們堅信，“在我們向學員介紹英文的過程中，他們的視野也會得到擴展。”⁵⁰ 不過，與聖若瑟修院不同，他不再開設早已不是日常用語的拉丁文。另外，馬禮遜學校十分重視引入西方的科學，馬禮遜教育會《章程》的附則中就明確規定：

關於課本方面：(1) 本校課本旨在教導學生學習閱讀、寫作、數學、地理及其他科學，並以英文及華語教授，以期獲得最佳效果。(2) 一如基督教國家之優良學校，藉教師之教導及幫助，各學生必須完成《聖經》課程，惟其接受之教義信仰，實非作為學生資格認可之證明。……⁵¹

吳義雄教授曾根據收於《中國叢報》中的《馬禮遜教育會年度報告》，整理出馬禮遜學校第一班（容閱就讀於此班）由 1839 年至 1846 年間所設的課程及所用的教科書：⁵²

表1. 馬禮遜學校第一班學生課程表 (1839-1846年)

年度	所學課程與教科書				備註
1839-1840年	英語閱讀和口語： 布朗編寫的教材	地理： Parley編寫的教材	算術：Gordon編寫的教材		
1841-1842年	英語閱讀： <i>Gallaudet's Child's Book on the Soul</i>	地理： <i>Guy's Geography</i>	算數	歷史： <i>Peter Parley's Method of Telling Stories about the World</i>	歷史課講授英國與美國歷史上的重要事件
1842-1843年	英語閱讀、寫作、書寫練習	地理	算術、代數： <i>Colburn's Intellectual Arithmetic, Sequel</i>	歷史： <i>Keightly's History of England</i> (羅馬入侵至查理一世時期)	
1843-1844年	英語閱讀、寫作、英語書寫	地理： 歐洲、非洲及部份亞洲地區的自然的地理	算術、代數、幾何： <i>Colburn's Sequel</i>	歷史(同上年度)： 查理一世至維多利亞女王時期	1841年5月開始學習力學三大運動定律與萬有引力定律
1844-1845年	英語閱讀、寫作： <i>Goodrich's Third Reader</i>	地理： 各種地圖地理	算術、代數、幾何	力學初等課程	本年度開設聲樂課程
1845-1846年	英語閱讀、作文： 以《聖經》為教材		代數： <i>Colburn's Algebra</i> ; 幾何： <i>Euclid's Elements of Geometry</i>	化學： 由巴爾弗醫生講授	

從以上情況可見，馬禮遜學校的課程不同於聖保祿學院和早期的聖若瑟修院的課程，該校雖然設有聖經課，但其整個課程體系不是以宗教為中心的，也不以宗教為最高位階；而且，它將科學課程置於核心的位置。所以，在澳門的教育史上，馬禮遜學校的課程第一次表現出“公共教育”的氣質，面向所有民眾，具有明顯的世俗化的特點。這樣，它“不僅為澳門以後的近代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範式，而且在西學東漸的歷史上也具有頗為重要的意義。”⁵³

二、官立及葡文學校的課程

前文的分析已讓我們看到教會學校的影響，那麼近代以來許多國家和地區逐步興起和壯大的公立學校及其課程，在澳門的情形又如何呢？

(一) 官立及葡文教育的興起

澳門的公立學校歷來不發達，即便到今天，其所覆蓋的學生也不到總人數的5%。原因在

澳門研究

於澳門的公立教育直到二十世紀中葉一直僅限於葡裔居民，而早在此前至少一百年，華人已在澳門的人口中佔據了絕對支配的地位。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公立教育的發展以政府公共教育職能的發揮為前提，而澳門的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職能歷來沒得到充分發揮，甚至政府本身的架構就未能真正發育。⁵⁴

澳門從開埠到十七世紀，都是由議事會來管，嚴格說不是政府的管理，而是居民的自治。後來，荷蘭人企圖攻佔澳門的威脅讓“兵頭”的力量逐漸加強，最終演變為總督，管治的力量才開始加強。直到1762年，聖保祿學院和聖若瑟神學院因葡萄牙龐巴爾（Marquês de Pombal）把耶穌會驅逐出國土和海外省而遭查封，以致形成教育真空，朝廷才意識到要採取措施擔起教育國民的任務，公共教育才開始發展，政府專門管治教育的機構亦開始設立。在葡國國內，這些機構包括1759年設立的學習總監（Directoria Geral dos Estudos），1771年設立的皇家審查會（Real Mesa Censória），1794年的國家學習和學校總監會（Junta da Directoria-Geral dos Estudos e Escolas do Reino），1835年的公共教育高級委員會（Conselho Superior da Instrução Pública），到1844年，公共教育高級委員會被恢復，運作至1859年被併入國家事務部（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do Reino）。在澳門，在葡國國內龐巴爾改革的推動下，十九世紀早期曾出現了教育國有化跡象，葡籍學者巴拉塔（Aureliano Barata）1999年在《澳門的教育1572-1979：對歷史的貢獻》一書中指出：“那段時間組建了王室學校，其中比較著名的教師為José Baptista Lima和他的兒子José Baptista Miranda e Lima。但是，這些學校並不能滿足澳門人民，確切地說是中國社群的需要。”⁵⁵

按照巴拉塔的觀點，澳門開埠後教育經歷了很多階段：

第一時期（1572-1772年）：天主教堂獨佔教育領域。

第二時期（1772-1835年）：龐巴爾公立教育佔主導，中文民辦教育網路開始發展。

第三時期（1835-1894年）：自由主義大改革，引入了更為專業的教育監管機構。澳門公立及私立中學教育的開端。

第四時期（1894-1946年）：市政廳主導官方幼稚園及小學教育。中文民辦教育大量增加的時代。

第五時期（1946-1976年）：官方教育國有化及中文民辦教育網路穩定化，天主教堂也有重要參與。

第六時期（1976-1987年）：教育廳轉型為服務局。官方葡中教育被認可，建立中學教育且相關網路開始發展。澳門教育體系法準備工作開始。

第七時期（1987-1998年）：所有規模的教育進行“革命”，通過第11/91/M號法律及補充法令建立了澳門自己的體系。⁵⁶

從中可見，澳門政府比較明確和連續地介入公立教育事務，是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的，但當時的公立學校主要是通過市政機構來辦理。澳門檔案館有關“教育廳”的記載對澳門公共教育的組織沿革有大致的說明，⁵⁷其中提到：“十九世紀中葉，葡萄牙以推廣教育為己任，於1870年設立政府部門負責監督和視察由國家及私人機構開辦的學校”。（1870年11月2日第二號國令）後來，政府成立公共教育督導團及附屬部門，督導團具備諮詢及視察功能，並委任本地理事會視察教學活動。此後，澳門公共教育的管理經歷了許多改變。1879年，成立首個監督及視察所有公共教學活

動的組織——“公共教育督導委員會”（Public Education Inspection Council），並頒佈了小學教育法規（1873年2月3日第十八號訓令）。1893年，頒佈中小學公共教育法規，小學教育管理屬市政廳權限；同時創立澳門國立利宵中學（Liceu Nacional de Macau），公共教育督導委員會的權限亦向中學校育延伸。

一個歷史性的改變發生在1926年，“政府提出把幼稚園及小學教育撥歸殖民地政府的管理及行政範疇，終止向市政廳支付國庫收益2%作資助”（2月20日第8號澳門省政府憲報第7號議定書）。另一歷史時刻是1928年，政府委員會建議教育服務的管理權完全“由市政廳轉移至殖民地政府”（1月27日第一號澳門殖民地公報第1號議定書）。⁵⁸這意味着，由政府直接管理和經營的、具現代意義的公共教育體系開始建立，並在此後一步步得到擴大和改進。最終如巴拉塔所言：一方面，“中國人社群根據中國內地當時的課程類別，創建了他們自己的學校”；“而官立教育則使用葡萄牙的課程類別，經過長期的融合相處，中葡人民創造了一個唯一而獨特的澳門的教育模式——中葡教育。”⁵⁹

（二）幾所重要學校的課程

如前所述，澳門早期的葡語教育是依託教會學校進行的，實質是宗教教育，從文化類型的角度看，並不具有獨立的文化意義。但是，十九世紀中、後期，特別是二十世紀初發展起來的已獨立於教會學校的葡文學校，以及以葡文為教學語言的公立學校，完全褪去了宗教教育的色彩，課程以世俗需要為取向，並力圖體現宗主國正宗的葡語和歷史歸屬感，以及葡萄牙文化和葡人社群生活的整體訴求。因此，它們被賦予新的文化使命，客觀上也給澳門帶來以葡語為載體的新的文化支脈。

不過在經歷鴉片戰爭之後，香港的崛起對澳門造成很大衝擊。對教育而言，首先是澳門葡人的外移。據李長森、施白蒂、平托

（Carlos Lipari Pinto）和白樂嘉（José Maria Braga）的研究，1840-1910年，居澳葡人從5,612人減少到3,839人，1860年為4,611人；其間移居香港者，1848年有300人，1860年有800人。1896年2月13日，在澳門以外亞洲各商埠的葡人共2,380人，其中香港就有1,389人。⁶⁰葡人外移在教育領域的直接後果是本地學生減少，施白蒂指出，1910年就有“560名葡萄牙學生離開澳門前往香港及上海就讀”，而“當時（1909年至1910年）在國立中學葡語班就讀的學生總數為28人。”⁶¹可見，葡人子弟往外就讀直接影響了本地學生的人數。

另一方面的影響是文化和課程上的。因為香港經濟的崛起極大地凸顯了英文的重要性，學校在語言類課程的安排上必須打破原有葡文教育的安排。大批移居香港的葡人在當地形成自己的社區後，與天主教會一起開辦自己的學校。“至1849-1850年間，香港已經有了三所為葡萄牙籍男孩的學校”，女子教育則始於1860年，當時葡人子女最多的是天主教會辦的聖若瑟書院、意大利修院女校等。⁶²在課程上，這些學校依然重視葡萄牙語的學習，但英文倍受重視。這對當時及其以後澳門的葡人教育產生影響，因為澳門的許多年輕人都更願意去香港發展。

所以，澳門官立學校和葡文學校的課程，在體現葡萄牙文化和民族傳統的同時，吸納了英文和現代科技文化，是一種新的課程傳統。

1. “土生葡人新學校”（Nova Escola Macaense）的課程

“土生葡人新學校”是澳門土生葡人在十九世紀中期辦的一所學校，⁶³據施白蒂的記載，該校於1862年1月5日開學，運作至1867年10月21日關閉。其經費主要靠發行彩票和募捐，“1861年2月5日，塞卡爾（Cercal）男爵建議：鑑於澳門教育設施匱乏，應創辦一所男校，主要教授葡萄牙語和英語”。

澳門研究

同年3月6日，基馬拉士總督批准塞卡爾男爵每年可組織一至兩次彩票發行，所得資金用於擬議成立的男校。1962年2月27日，塞卡爾再次“獲准每年發行一次彩票，集資數目定在1,200帕塔卡”。⁶⁴1867年10月21日學校關閉，塞卡爾“將此校送給澳門政府以改建為一所官校”⁶⁵，其後利用學校基金和募捐籌款所得成立了“推進澳門教育會”。

關於該校的課程，根據1862年4月27日刊於《華友西報》的章程，該校“提供小學與中學教育”，課程包括葡萄牙語、英語、初級拉丁語、算術和地理。⁶⁶由於該校主要面向葡人，而當時的葡人教育在語言教育上既重視葡語，也非常關注英語，同時保留了拉丁語。當時不少葡人子弟去香港等地上學，而該校主要為那些家庭沒有條件送他們去海外就讀的孩子而設，經濟困難的還可以免費，因此學校的課程也開始重視英語。根據塞卡爾1861年3月23日在《華友西報》刊登的公告，“學校必須僅限於教授葡萄牙語、拉丁語和英語”⁶⁷。另外，與此前的馬禮遜學校一樣，此時的世俗中小學教育也已把地理作為重要課程。這兩點，均與十九世紀的華人教育形成鮮明對比，展現了澳門課程傳統的不同來源。

2. 澳門商業學校的課程

“澳門商業學校”（Instituto Comercial de Macau）是另一間在澳門具有重要意義的學校。該校成立於1878年1月8日，由澳門土生葡人教育促進會（APIM）創辦，剛成立時校舍設在聖若瑟修院中，僅有四位教師執教。⁶⁸著名漢學家伯多祿·施利華（Pedro Ayres da Silva）擔任其首任校長，以致民間通常稱該校為“伯多祿商業學校”。最開始，學生人數並不多，頭三年的學生分別為21人、18人、13人。但1881年，該校在聖若瑟修院改組的時候與其合併，修院強有力的師資令其商業課程產生很大影響。⁶⁹但該校到1910年最終關閉。因為1901年高士德總督發佈訓令成立了作為市政教育機構的“澳門商業學校”，最初附屬

於利宵中學，採用葡國商業中學制度。到1919年，該校最終獨立，再以“澳門商業學校”命名。這樣，澳門第一間商業專科學校，由民間機構轉為政府學校，服務於澳門商業的擴展。

很明顯，這間學校最重要的參與者和主導者是葡人而非華人，但它與葡人過去舉辦的學校的最大不同在於，它服務於現代商業的發展，以及葡人子弟參與新型商業活動的需要，而不是以宗教的需要為目的。因此，該校的課程和教學具有很強的世俗化、實用化的特點。據文德泉神父的研究，該校剛開辦初期的課程包括算術、代數、商業會計；學習葡文的同時，也有英文（初級和高級）、中文書寫、書法；還有自然科學基礎課程（每週兩次）、歷史、地理。當然，也有天主教義。⁷⁰另外，1919年10月7日，澳門政府還批准了在中心商業學校教授漢語的教學大綱。⁷¹

綜上可見，澳門商業學校的課程以商科為特色，重視英文；既服務葡人，也向華人開放。既幫助澳門商業的發展，也對學員前往香港和上海就業提供幫助。該校在澳門乃至中國的教育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3. 利宵中學的課程

還值得注意的一間重要學校是前文提到的官立葡文利宵中學，該校1893年7月27日獲葡國王批准設立，次年9月28日開幕，其誕生“使澳門葡人社群一直以來的願望成為事實”，時任總督讓市政廳、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與澳門政府一起為這個項目提供了資金。⁷²

開辦初期，利宵中學沒有高中，而且學生人數不多，在1894-1906年的十餘年裡，每年平均就讀人數只有20-25人。⁷³對此的一種解釋，是因為聖若瑟修院及聖羅撒女子中學與這個新學校教授的課程是一樣的。⁷⁴根據澳督高士德1894年8月14日頒佈的《利宵中學章程》，利宵中學的課程的確與同時期的聖若瑟修院和聖羅撒女子中學提供的同類課程沒有太

大分別。各年級基礎性的課程包括：葡語、法語、英語、基礎數學、歷史、物理、化學、自然史以及葡語文學；高年級則有多個水平的拉丁文、基礎哲學，同時繼續學習哲學、歷史、物理和葡語文學等。⁷⁵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它雖然是政府的公立學校，沒有宗教教育的需要，卻仍舊強調早已不是實用性語言的拉丁文。而馬禮遜學校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摒棄了拉丁文。這種鮮明的對比，突顯了利宵中學在文化意識上的保守性。事實上，早在1860年，英國著名哲學家和教育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就已提出“甚麼知識最有價值”的問題，核心的理念是科學知識最有價值，因而提倡科學教育，反對古典主義教育，尤其反對過於重視拉丁文。

如前所述，1910年澳門有大批葡萄牙學生離開澳門前往香港和上海就學，而同時間國立利宵中學葡語班就讀的學生卻非常少。可見，隨着港澳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差距的拉大，年輕人更多希望在外地企業中謀求職務，或赴港升入當時新成立的香港大學；另一方面，也說明本地的中學教育急需改革。1907年，政府曾提出中學教育改革方案，1910年再進行修訂。其中對於利宵中學，改革的建議是“根據振興學會的模式……改為商業中學。”因為“該校雖為私立學校”，卻“無法接納一切有興趣就學者”。⁷⁶

利宵中學課程的另一個問題是與小學課程的銜接，文第士在1915年評論說：“利宵中學一二年級的內容大部分與小學的大綱是重複的。學生在利宵中學報名讀書後，所學的大部分內容他們已經學過了。然而，教師換了、教材不同、教學流程不同，所以學生在利宵中學的很長一段時間都找不到方向。”⁷⁷

為了改變這種情況，總督賈也度（Eduardo Galhardo）成立了一個由政府秘書長利馬（Mario Bandeira de Lima）主持的委員會，主要是為了修改利宵中學組織法及相關規定；

重新整頓澳門小學教育學校；提出措施改進面向中國人的葡文學校。利宵中學直到1919年學生就讀率才得到提高，並成為中央學校。委員會的一系列工作之後，1901年誕生了由市政廳監管的商業學校，並針對公立小學制定了新的規定。

三、華人蒙學課程的革新

相傳二百多年前澳門沙梨頭土地廟已有“更館社學”，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望廈村趙元輅、趙允菁父子先中舉後也曾先後在澳“設館課讀”。⁷⁸但是，澳門華人教育的真正發展是在鴉片戰爭以後，特別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後。這與澳門華人人口數量的急劇增加，特別是華商群體的興起以及隨之而來的華人在澳門經濟社會生活中地位的提高有關。由於戰爭令內地社會紛亂，廣東尤重，十九世紀中期後許多士紳、商人甚至官吏紛紛攜資產入澳門，澳門的華商集團形成，華人開始部分參與政府行政事務；華人社團紛紛成立，1871年建立鏡湖醫院，1893年成立“同善堂”和“仁濟社”⁷⁹。華商秉承中國傳統文化，同時基於家業和宗族傳承的需要，開始捐辦教育。

（一）早期的私塾課程

有研究指出，清末以前澳門華人自己的教育場所通常是塾師所設的私塾。“相傳澳門學塾，分蒙館與經館兩種”。蒙館一般教授《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四子鑑》《四子書》，並習字、認字、屬對。經館熟讀《春秋》《詩經》《易經》《尚書》《禮記》等五經，並且研習古文，乃至明清的闡墨文和八股文等。⁸⁰

然而，澳門的學童大都於蒙師學塾完成後，即進入商場謀生，除了極少數殷富子弟之外，甚少轉入經學大館讀書。相傳澳門有鋤經學塾、道南學塾、陶瑞雲學塾、蕭蓮舫學塾、孔厚田學塾、林老虎家塾、子褒學塾，以及子韶學塾等。

澳門研究

除了私塾外，還有兩種教育形式。一是“大家庭延專師”，一些殷富僑民或告老官宦的大家庭，延聘文行兼備的教師入屋為子弟授課，相傳澳門有屈屋、高屋、陳屋、盧屋、蔡屋、傅屋、鄭屋等。二是“大漁船延專師”。過去澳門漁業最為發達，居民中常住船上的漁民比例不少，以1910年為例，澳門人口共74,866人，其中19,041人常年居住在船上。⁸¹這些漁民或單獨聘塾師隨船授課，或若干漁家合作延聘，延聘專師方式與岸上大家庭類同。二戰的炮火令漁業萎縮，漁民才紛紛送子女上岸接受教育。⁸²

上述兩類私塾，僅在形式上不同於塾師所開設的私塾，課程上並無二致。

（二）從“鏡湖義塾”到“鏡湖義學”的課程轉變

澳門華商開辦最早的學校，是1892年開辦的“鏡湖義塾”。⁸³當時，澳門“失學兒童，隨處可見”，富商曹周二姓“特捐送產業入鏡湖醫院，聲明以年中收租若干成，撥充興辦義學經費”，分別在連勝街、賣草地、新埗頭、水坑尾、新橋五處各設義塾一所，總稱“鏡湖義塾”。

所謂“義塾”，實乃“私塾”，“鏡湖義塾”亦屬於私塾性質，課程極為陳腐。據王文達先生記載稱：

查該項義塾，一如舊時之私塾，惟免收學雜費而已。每塾特聘宿儒一位，擔任講教。塾內立孔子，設戒方，讀三字經，及四書、古文、尺牘等，如是者竟歷十有餘年矣。⁸⁴

此時，澳門華人學校還十分傳統，沒有施行現代學校制度，學校形式為傳統私塾者多，性質上屬於蒙學教育，教材以《三字經》等蒙學課本為主。正如來華的英國傳教士麥高溫在1860年以局外人的身份，對當時中國傳統教材

一針見血地批評說：“中國的課本，也許是學生手中最枯燥、最陳腐、最古怪的東西了，書的作者恐怕從來就沒有考慮過學生們的興趣愛好。書的內容因單調而顯得死氣沉沉，既缺幽默又少機智，它們最大的‘功勞’似乎就在於從來不會在孩子們那活潑愛笑的臉上增加一點兒輕鬆”⁸⁵。

中國舊式教育主要專注古典文學和中國歷史，見不到自然科學、地理、他國歷史等知識。清代“多數學塾的課程比較簡略，集中在品德修養、識字及應對日常生活所需的生計教育之上。”⁸⁶曾於1839年擔任澳門馬禮遜學校校長的美國傳教士布朗說，在中國，“一些最基本的科學事實也極少介紹到教科書中來，更談不上成為專門的學科”⁸⁷。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經歷了洋務運動，有識之士逐步認識到不能只限於引進堅船利砲，也要學習西方的制度、文化與教育，才能從根本上革新孱弱的國家。同時，滿清政府受到列強的影響，開始醞釀並頒行新學制。在此期間，澳門得風氣之先，華人的教育由傳統轉向現代，成為澳門教育的一個分界點：一方面，華商們紛紛參與舉辦免費性質的義學，華人子弟入學者日眾⁸⁸；同時，他們引入西方的現代學校制度，改革學校課程。

例如，前述“鏡湖義塾”於1905年裁撤五所義塾而另闢地設“鏡湖義學”，按新式學堂辦理。當時，收已入學者150人，設甲、乙、丙三班；另收蒙學兒童80名。同時，“另訂課程”，最重要的是重視體育。學校設有運動場，“購置體育器械，並為學生購置操衣”，“德智體三育並重”，堪稱一所真正的小學。⁸⁹該校1912年正式改為“鏡湖小學”，按照民國政府教育部立案，分初小、高小共七年。1948年，與“澳門平民小學校”合併，改稱“鏡湖平民聯合小學”。

（三）“子褒學塾”到灌根學校的課程與教材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維新派陳子褒於1899年開辦的“子褒學塾”。1912年，子褒學塾易名灌根學校。

陳子褒主張新教育，廢除讀經，積極興辦婦女及兒童的教育。他自編五十多種適合婦兒的白話文教材，是當時課程改革的先行者。子褒學塾既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又能肯定傳統的優良文化，以尋求中西文化融和為主旨。⁹⁰在此清末中國需要變革的大氣候下，無論是對於舊私塾和傳統教材的改造，還是對於新教育的提出與實務上的探索，陳子褒在中國均為先行者，為中國教育的轉型和現代化作出了寶貴的貢獻，堪為當時新式學校的模範，蔚成一番風氣。

（四）華商學堂、培基中學和崇實學校的課程

中國學校課程從整體上脫離傳統蒙學教育，是在戊戌變法尤其是1905年廢科舉、興學堂之後。至辛亥革命之後，所有學堂漸改稱學校。學塾與學堂、學校有何區別？“前者則只是一二老師宿儒所設之訓館，收徒教學，只授經學古文，間或兼教珠算信札而已。後者則已認識德智體群並重，具備現在學校之型式矣。”⁹¹廢科舉前後，中國才真正施行現代意義的新學制。華商學堂是澳門華人辦的第一所真正意義的新式學堂。

華商學堂大約創辦於1909年，戊戌變法失敗後由康、梁黨人開辦，設於澳門天神巷三十七號宋氏大屋原址，學生大約一百餘人。該校雖如曇花一現，僅辦一兩年就結束，但在澳門華人教育史上是新式學堂的肇始。其課程有光緒時代《欽定學堂章程》（1902年）和《奏定學堂章程》（1904年）所附課程⁹²的特點：一方面，依舊要研讀“經學訓詁”（類似於“講經讀經”），些許保留了中國傳統教育的痕跡；但更重要的是引入了現代學校的課程理念，學生按程度分甲、乙、丙、丁各班，“各

科如圖畫，唱歌，體操，遊戲皆備”“況其尤重體操”“屋傍闢一碧草廣場，設有鞦韆架，運動儀器等”。⁹³

華商學堂關閉後，同盟會員潘才華於1910年開辦的培基中學，設在澳門峨眉街四號。該校初為“培基兩等小學堂”，後增設中學，成為當時華人在澳門辦的唯一一間中學，培養了馮雪秋、趙連城等大批人才。

另外，1909年梁彥明辦的崇實學校，1910年孔教會辦的孔教學校；1914年華人創立“樹人會”，開辦澳門英文學校；1923年，陳公善辦陶英小學，吳寄夢辦勵群小學。這些，都是華人知識分子在“教育救國”的感召下，對教育事業的積極探索。⁹⁴這些學校逐步開始在澳門實踐新式課程。

總之，華人教育是澳門教育的重要一脈。其出現，未必比耶穌會和葡人教育晚；但其普及性和規範化，尤其是課程與教育內容的近代轉型，卻毋庸置疑是比較晚近的事。不過令人振奮的是，到了二十世紀初期，華人教育有迎頭趕上之勢。此時，天主教教育、澳門政府的公立學校以及華人舉辦的私立學校，如三股蜿蜒而至的溪流，站在了同一個起點上。其流量和過去的影響或許不同，但從此以後，她們必然要匯聚在一起，共同書寫澳門的未來。

四、“三軌並行”課程與澳門多元的文化脈絡

從前文的分析可見，澳門近代“三軌並行”的課程格局，並非一開始就有，而是逐步形成的。十九世紀以前，澳門教會教育佔主流，且僅限於天主教。學校在文化上具有濃厚的天主教情結、拉丁文化色彩，並深受葡萄牙文化的影響。故在十六世紀開埠後的大約兩百五十年時間裡，澳門的學校課程基本上只有天主教這一個軌道。

進入十九世紀後，首先的改變是基督教新教的加入。這是一個重要的文化事件。基督教

澳門研究

新教的到來，引入了英語以及以其為載體的文化，而且新教教育明顯加強了科學課程。隨着十九世紀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改變，包括聖若瑟修院在內的天主教學校也開始重視英文，而後來新開設的一批天主教學校，則整體承接了以馬禮遜學校為代表的新教的課程傳統。所以，教會學校課程這一“軌”到十九世紀末已有了根本性的轉變。

十九世紀的第二個重要改變是澳門官立學校和葡文教育的興起。這個過程發軔於二十至三十年代，七十年代進一步加強，八十至九十年代官立學校從幼兒教育到中學教育，形成了初步的體系。在教會學校幾度衰落並轉而擁抱英文之後，官立學校和葡文課程的文化取向，當然要擁抱葡語文化，當時的官立學校和葡語課程成為葡語文化和葡人利益的捍衛者。

澳門近代的華人教育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伴隨着華商勢力的壯大而興起，九十年代形成一定規模。華人教育以中國傳統教育為基礎，其課程的文化取向與前兩“軌”完全不同。華人的學校後來雖然也開設了英文，加強了科學課程，但在文化上是中華文化認同為根本目標的。所以，澳門“三軌並行”的課程格局到十九世紀末才最後形成。這一點對於學校課程與澳門文化演變的關係，帶來重要影響。

（一）課程與文化的雙向影響

就教育與文化變遷的關係而言，學校課程既是社會文化的享用者和繼承者，同時也是文化的生成者、傳遞者甚至創造者。

在澳門過去五百年的歷史裡，華人與葡人是澳門文化和教育的主角；而就文化的構成而言，中國文化、葡國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和英語文化，是澳門文化的四大來源。在澳門教育這首已奏響五百餘年的“交響樂”裡，他們參與的時間有先有後；其音色及要表達的意欲各有不同；而他們“音量”上的此消彼長，則一直延續至今。不管怎樣，這樣的脈絡、這樣的

歷史，其實都與學校及其課程密不可分。可以說，正是學校課程的身影，擔當了文化的使者，溝通甚至成就了文化之脈。華人與葡人的教育，以及天主教的教育，在文化上不論分隔還是融合，相互尊重亦或暗地競爭，都可以從澳門的課程發展史上找到註解。我們可以通過學校的課程，來梳理澳門文化的整體脈絡。

從歷史上看，澳門的教育主要有兩個部分：本地居民的教育，以及傳教士和其他神職人員的培養。前者包括華人的教育和本地葡人的教育，對其影響，我們過去早有留意；但對於傳教士和神職人員的培養在澳門教育與文化變遷上的影響，人們可能普遍認識不足。絕大多數學者估計不會想到，拉丁文曾經是澳門流行的第二大外語，而澳門的學校長期將拉丁文作為必修課，以致在英國最傳統的中小學都早已不再教拉丁文的二十世紀初，澳門聖若瑟小修院和利宵中學的學生們，還在學習拉丁文。

教育及其課程是不同文化之間的橋樑，正如葡籍學者巴拉塔所指出的：“天主教教會很早在澳門設立基地，其中著名的耶穌會向中國人敞開其學校的大門”。⁹⁵葉農教授在研究十九世紀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的文化適應時也注意到，“葡萄牙人子女的教育問題一開始就與天主教教育和葡萄牙語學習聯繫在一起”。⁹⁶顯然，這都是對學校課程與文化脈絡關聯性的生動註解。

（二）課程的區隔與文化的分割

澳門的文化在歷史上到底有哪些來源呢？一般的看法是“中西雙源論”，認為中華文化是澳門文化的主流，但明清以來澳門作為西方文化進入中國乃至東方的門戶和樞紐，西方文化也是澳門文化的重要來源。正如劉羨冰校長所言：“澳門中西教育並峙，雙軌平衡發展400年。”⁹⁷

但細心品味，上述說法似乎過於籠統。“西方文化”只是一個總體性的概念，其內部有很

多分支，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文化，同中有異，相互交織，對澳門乃至中國的影響在程度和時序上都有不同。以基督教在粵港澳所舉辦的教會教育為例，雖然都是教會教育，但不同時期的影響力和文化後果很不同。新教進入澳門前，最主要的辦學力量表面上是天主教的耶穌會，但由於葡萄牙自十五世紀末以來擁有東方保教權⁹⁸（Padroado），耶穌會在東方的發展主要依賴葡萄牙王室的資助，以及依靠葡萄牙在東方諸多的據點建成的傳教網絡。所以，在此階段葡萄牙的影響其實很大，聖保祿學院和聖若瑟修院的課程中都有葡文。因為耶穌會士基本上都要學習葡文，“前往東方傳教的各國耶穌會士，除了要效忠教宗和耶穌會總長之外，也要效忠於葡萄牙國王。”在葡萄牙海外勢力最強盛的十六世紀及十七世紀前期，葡語不僅是各東方商業據點的主要商業語言，而且是在東方流行的主要傳教語言。⁹⁹而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由於英、美等強國的興起，葡萄牙已經從一個世界性的大帝國開始逐漸淪為一個西歐小國，因此教會學校已由新教主導，馬禮遜等英、美傳教士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湯開建教授就認為，澳門的西方教育不可一概而論，它至少應分為三大類：一是天主教教育，十六至十九世紀中天主教教育是澳門教育的主體；二是基督新教教育，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紀中葉的一段時間；第三類為公共教育，起步很晚，是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聖保祿學院和聖若瑟神學院關閉以後才出現的。¹⁰⁰

澳門文化的另一個問題是中西、中葡文化並未真正融合，在“不同而和、和而不同”之中，不同文化之間是“齊頭並進”的，缺少深層的對話，更沒有經融合而達成新文化。澳門常常被描繪成“文化的博物館”，但“共存”遠多於交匯和對話：“澳門歷史和澳門歷史研究卻存在明顯的雙軌——華人社會一條線，葡人社會另一條線。雖偶然相遇，但由於政治和文化背景的顯著差異，雙軌基本上保持平行。”¹⁰¹

文化上的區隔與澳門教育有十分密切的關聯。中、葡兩個民族的教育傳統都對澳門教育產生了深刻影響，但中、葡兩種學制、學校系統長期涇渭分明，呈現一種河水不犯井水的狀態。如前所述，二十世紀前三十年，澳門華人教授四書五經的傳統學塾、書屋，逐步轉向西式學堂，其原因並非受澳門本地西式教育的影響，而是根源於其文化母體的教育變革，即科舉制度的廢除以及清末開始的學制改革。同樣，葡文小學至二十世紀末仍然保持四年制，也是與葡國教育一脈相承的。¹⁰²到澳門回歸的時候，澳門仍舊是四種學制並存，而且各自發展。有葡籍文化背景的知名人士評論說：

澳門的所有教育系統都是單一文化性質，澳門教育系統下誕生了這些小島上生活的多文化背景的人們。澳門一直存在單一文化的政治文化問題，很少鼓勵代表性和 / 或跨文化的對話。

因此，雖然澳門具有很大的文化多元性和“可控”的組織和人事，但其尚未能建立一種教育範式和具有原始特徵的公民文化模式，建立屬於多元文化背景的價值觀。¹⁰³

（三）“三軌並行”課程對文化的具體影響

1. 西方宗教在澳門乃至東亞的傳播

澳門號稱“天主聖名之城”，可見西方宗教進入澳門並在此逐步傳播是澳門開埠以來最重要的文化事件。西方傳入澳門的宗教有多種，包括猶太教、伊斯蘭教，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六至十九世紀的幾百年間天主教始終是澳門唯一至尊的西方宗教。當然，基督教新教在十九世紀後在澳門產生了較大影響，不過相對於天主教而言，它只是在夾縫中獲得生存的。¹⁰⁴

教堂的擴充是天主教傳播的重要標誌。澳門主教區於1576年建立後，天主教各修會紛紛駐足澳門，將澳門作為自己對中國內地及遠東

澳門研究

地區傳教的基地。因此，在澳門開埠之後的百餘年間，天主教獲得了空前的發展。1578年，澳門居民約一萬人，已有五座每天做彌撒的教堂，並在其周邊形成居民區。1670年（康熙九年）澳門面臨全面海禁，澳門的天主教依然表現得很繁榮，有教堂10座。“在十七至十八世紀澳門天主教發展的黃金階段，澳門教堂總數已發展到15座”。¹⁰⁵

西方宗教在澳門傳播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基督徒人數、特別是華人教友人數的增加。據記載，創建澳門天主教傳教基地的第一位神父——龔薩雷斯1571年報告說，他剛到達澳門建立起第一間茅草教堂時，授洗了75名中國教友。1565年，澳門有5,000名基督徒，而這主要是葡萄牙人及其奴僕，華人並不多。¹⁰⁶至1582年，澳門葡人約兩千戶，2.2萬至2.5萬人，均為基督徒，華人教友依然很少。但1602至1634年，澳門耶穌會先後兩次建教堂專門向華人講道傳播福音，因而到1635年葡人基督徒人數減少至約八千五百人，華人及其他民族基督徒則增加至8,500人。而到1644年，由於明朝滅亡，滿人入關建立清朝統治漢人。原居於澳門的華人在情感上有亡國喪家之痛，在政治上不願做異族統治者的“順民”，故又有一大批華人加入天主教。當時澳門總人口約四萬人，葡人、華人各半，均為基督徒，換言之，華人教友從1635年的8,500人迅速增加到大約兩萬人，澳門居民差不多全都成為基督徒。至十七世紀末，澳門人口為2.05萬人，其中1.95萬人（即95%）為天主教教友，可見這是天主教在澳門發展的全盛時期；更重要的是，此時葡人基督徒因1648年的大饑荒和清朝1660至1683年長達20年的海禁而減少至僅兩千人，而華人基督徒達1.85萬人。不過，隨着澳門教區的衰落，澳門華人教友的人數也減少了。據教會機構的資料，1833年澳門、沙梨頭、望廈拱北的華人基督徒加一起也不過七千人。¹⁰⁷

從以上情況可見，天主教在澳門的傳播並不完全取決於教育，海禁、饑荒、王朝的更替、

教區管轄權和管理狀況的變更，以至梵蒂岡和葡國宗教政策的改變，是影響天主教傳播更重要的因素。但是，從傳教的策略和途徑上看，“教育傳教”與“醫療傳教”和“書籍傳教”一樣重要。澳門的特別之處還在於，無論是天主教還是基督教新教，都把澳門視為進入中國內地、日本以至整個東亞地區傳教的一個關鍵樞紐，因此教育以及教會學校的影響不僅限於基督教文化在澳門本地的傳播，以及教友數量的增長，更重要的是培養傳教士，為傳教輸送大量宗教人才。

這方面的作用，尤其體現在天主教特別是耶穌會在澳門舉辦的教育。如前所述，無論是聖保祿學院還是後來的聖若瑟修院，都以培養傳教士和宗教人才為直接目的和首要任務。前者附屬於日本省，其高級課程完全為培養傳教士而設；後者主要為進入中國的傳教士服務，其“大修院”的課程以“小修院”為基礎，目標是培養優秀的聖職人員。因此，他們都非常重視拉丁文，宗教課程都達到當時教會大學的水準。不僅為一批批來自歐洲的傳教士在進入日本、中國或其他地區之前學習當地語言和文化的機會，而且培養了一大批本地的神職人員。僅耶穌會公佈的資料就表明，“1578至1740年間先後有463位耶穌會士從里斯本來到澳門，1587至1630年間主要是進入日本，而1630至1740年間主要是進入中國”，“1590至1673年間，澳門還培養了59名中國籍神職人員，最著名的如畫家吳歷和澳門華人鄭瑪諾”。¹⁰⁸除歐洲傳教士外，耶穌會培養的澳門華人修士如鍾鳴仁、鍾鳴禮、鍾念山、黃明沙和徐必登等人，也先後進入中國內地傳教。而聖若瑟修院還為本地的教會培養了大批神職人員以及多位有影響的主教。其“小修院”和聖保祿學院的“讀寫學校”，則在不同歷史時期為澳門培養了一大批熟悉天主教教義、禮儀和音樂的畢業生，他們未必都加入天主教成為教友，但他們至少熟悉、理解西方的宗教和文化。

十九世紀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以馬禮遜為代表的新教的傳教士在傳教的方式上作了很

大的改變。他們不僅通過演講佈道、發放書刊或舉辦宗教儀式“直接傳教”，而且更熱衷於透過舉辦醫療機構、開辦學校或出版書刊介紹西方文化等曲折的方式，收到“間接傳教”的效果。正如有學者所言：

開辦學校，將西方教育制度和方法引入中國，是鴉片戰爭前後新教傳教士非常重視的一項文化活動。這種活動雖然不以宗教的傳播為直接目的，但其長遠的目標，則是通過對中國教育文化的影響來開闢傳教的道路，擴大基督教新教的勢力。因此，這種教育活動，既是一種有重要意義的文化交流，也是能產生深遠影響的傳教方法。¹⁰⁹

所以，與天主教早期在澳門所舉辦的學校相比，新教開辦的學校有兩個重要特點：其一，中英文並重，重視近代新的科學和技術，課程高度世俗化；其二，雖然開設宗教課，給學生發放《聖經》，但不以宗教教育為直接目的，因而也不再學習拉丁文。例如，英華書院對於獲准入學的東方各國青年“將不被要求宣佈自己信仰基督教，也不會被迫參加基督教禮拜儀式——但將要求他們這樣做”，還會要求他們參加所有公開的宗教講座；澳門的馬禮遜學校雖然“向每個學生發放《聖經》，並進行講解”，但“是否接受其教義不作為是否接受入學的條件”¹¹⁰。

這樣，基督教新教所舉辦的學校雖然沒有給他們帶來多少信徒，無論是馬六甲英華書院，還是澳門馬禮遜學校的學生，最後受洗的都並不多。學校教育與當時的教會醫院一樣，更像一種慈善活動。但正是這類體現近代文明的專業活動，逐漸在華人社會周圍營造出對西方文明信賴、欣賞的氣氛，以及對傳教士的感恩心理，而這正是傳教士所追求的傳播基督教的必要條件。

2. 中文與中華文化的傳承

由於便利的地理條件，澳門歷來就是中西文化交匯點。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澳門曾是傳教士學習漢語的基地，各國傳教士和日本、荷蘭、英國、東南亞等地的商人在進入中國內地前都先來到澳門，使得澳門成為“語言博物館”，著名漢學家羅明堅、利瑪竇先後於1580年、1582年來到澳門，在此學習漢語；此後，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艾儒略(Giulio Aleni)、衛匡國(Martin Martini)等著名漢學家都在澳門聖保祿學院學習過。澳門發現的文獻也證明了澳門在傳播中文和中國文化方面的貢獻。2011年，澳門有學者在市政署大樓圖書館、澳門利氏學社圖書館和聖若瑟修院等機構，發現了56本編寫於1742-1949年間的珍貴的對外漢語課本材料。其中，最早的一本是法國人傅爾蒙(Stephanus Fourmont)1742年作的《中國官話》(拉丁文名：*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¹¹¹；當然，最多的還是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前半葉留下的，因為鴉片戰爭後，天主教在澳門開始復甦，設立了獨立的華人傳教區，澳門再次成為傳教士入華前的培訓基地。而影響最大的，是被稱為“澳門功臣”的漢學家和翻譯官伯多祿(Pedro Nolasco da Silva)，他自己編寫了八本，翻譯了三本。¹¹²正是澳門幾百年來的對外漢語教育，為西人了解中華文化提供了可能。

就澳門華人內部而言，華人教育及其課程對於中華文化的傳承，無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早期的蒙館、學塾自不待言。前述“鏡湖義塾”“立孔子，設戒方，讀三字經，及四書、古文、尺牘等，如是者竟歷十有餘年”¹¹³。及後改為小學，更新課程，但學生課後依舊參加慶祝孔誕的活動：

1909年9月28日，澳鏡湖初等小學堂學生恭祝孔誕，引領各界到堂行禮。到者約千人，比上年更為慶鬧，各街高懸龍旗、燈籠，聞該學堂乃有殷戶捐資創

澳門研究

設，至今四年，本年約有學生三十餘人卒業，其成績可知矣。¹¹⁴

不僅是華人辦理的學校，甚至教會學校也開設中國傳統文化課程。1842年《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提到布朗校長的報告說：

上午用於讀漢語書與寫作。……在漢語學習中，他們仍被教導學習通行的書籍，……十名孩子已經背完或將近背完“四書”，並複習完它們，而在高一年級的一名學生則已經學習朱子評《四書》，並且努力理解它。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理解《孟子》，理解孔子著作的人少了一些，……有些人能將《孟子》中的段落翻譯成淺顯的英文。¹¹⁵

其實，中國文化的西傳也是如此。“1727年，聖保祿學院的分校聖若瑟修院成立。對西方傳教士而言，創辦於遠東的這所高等學府的最大價值，便是漢語課程的開設。他們於此研習漢語，學習中國文化，為進入中國內地傳教領取一張通行證。即使像已經具有數學教授職稱的艾儒略這樣的傳教士，也是在此獲得合格證書後方才進入內地傳教的。尤其是清順治、康熙兩朝，明確規定所有入華傳教士必須先在此修讀漢語兩年，聖保祿學院的地位及漢語課程的權威性便進一步得到了強化。”¹¹⁶

但不得不看到的是，明清時期澳門的教育總體上是由教會教育主導的，很清楚，在文化取向上重“西學”輕“中學”，中文教育以及中國文化的學習被置於邊緣化的位置。傳教士們自身學習漢語，多數人首要目的是為傳教找到一個“門徑”。當然，進入十九世紀之後，特別是新教傳入澳門後，教會學校課程的世俗化程度逐步增強，對中國文化的接受度有所提升。但是，基督教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總體態度是否定性的，在教育領域不僅否定科舉制度的價值，反對兒童背誦四書五經，而且激烈批評中國傳統蒙學教材的非科學性。加上後來教會學校普遍推行英語教學和白話教育，所

以導致畢業於教會學校的不少中國精英們英文比中文好，對文言文和傳統文化持否定態度，“很大一部分畢業生都成為了白話文的擁護者”¹¹⁷。

當然，白話文運動的興起有中國文化變革自身的內在必然性，絕不是由外部力量左右的。但是教會學校以及傳教士的白話傳教和白話出版，的確對白話運動的產生起到一定的前期準備和推動的作用。進入清末民初時期，以子褒學塾為代表的蒙學課程與教材改革，廢除讀經，改行白話文，在華人教育的內部，成為教育和文化變革的先驅，推動了後來的新文化運動。

由此可見，中國文化的傳承，還是要靠華人自己的教育。十九世紀末，在華人的學校教育沒有得到充分發展之前，澳門文化在事實層面為何還能“以中華文化為主流”？那是靠華人在澳門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優勢，以及社會日常生活對文化的浸染作用達成的，學校教育及其課程並非這一過程的主要貢獻者。

3. 近代科學和專業技術的引入

“西學東進”的內容除了宗教外，最重要的是科學和技術。由於澳門十六至十九世紀的學校以教會學校為主，因此宗教在其課程中佔有重要地位，尤其在聖保祿學院和聖若瑟修院時代。但是，十六世紀以後中西文化的最大差異還在於科學技術。學校課程在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不同時期側重點有所不同。

如前所述，耶穌會最早在澳門創辦的讀寫學校就已設置算術課程，此後的聖保祿學院、聖若瑟修院再到馬禮遜學校，科學課程的比例和科目數都一步步加強。原因主要是學校課程的世俗化傾向不斷加強，另一方面近代科學自身也正加速向前發展。一句話，從十六到十九世紀的三百多年，科學在學校課程中的份量和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力是相互聯繫地向上增長的。

西方技術的引進是近代澳門以至中國文化結構改變的重要方面。其中，望遠鏡、鐘錶技術、鑄砲技術、印刷技術、造船技術，還有天文日曆和地圖測繪等西方技術的引入，與澳門的關係最為密切。¹¹⁸ 跟科學知識的引入相比，技術的引進在時間上呈現越往後越密集的特點；同時，它與學校教育及其課程的聯繫沒那麼緊密，技術的引進更多是在社會的運用和生產過程中完成的，基礎教育僅起助力作用。

但印刷技術是一個例外。從木刻印刷向活字印刷的轉變，是我國向西方學習印刷技術的核心內容。“八、九世紀的木刻印刷出自中國社會內部的需要，十九世紀的西式活字則是基督教傳教士在西方勢力的助長下在中國推動傳播的。”¹¹⁹ 至十九世紀，活字印刷在西方已通行了近四百年。我國最早引入西方活字印刷機的是澳門，1586年，第一部西式活字印刷機就經由耶穌會帶來澳門，存放於聖保祿學院，印刷了大量宗教用品；1765年，耶穌會引入第二台西式印刷機。聖若瑟修院在1819年也開辦印刷所，購入活字印刷機。¹²⁰ 新教進入澳門後，馬禮遜開辦印刷所，首次採用中文木活字；同時期，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印刷所鑄造金屬中文活字。¹²¹ 此時，印刷的技術人員都是師徒相傳，不是在學校培養的。1900年11月16日，澳葡政府批准成立“官印局”。為培養技術人員，1901年12月，官印局技術及職業學校開始運作，該校一直運作到1920年。¹²²

對印刷技術和人才培養影響最大的是慈幼中學。1906年，雷鳴道神父率領五名慈幼會士來澳，創立“聖母無原罪孤兒院”，以教育貧苦孤兒為主，後來許多居民子弟入學，學生人數大增。1910年，改為“無原罪工藝學校”，開設“木工、縫紉、革履、排版、印刷和裝訂等六項工藝課程”，成為一所職業學校，培植專門人才。1943年，其中學部與粵華中學合併，改為“鮑斯高職業學校”，1952年改為“慈幼學校”，1964年創辦“英文中學電機科”。到1980年代，慈幼中學除木工、金工被保留並合併成機械科外，其他工藝課程均停

止運作。¹²³ 慈幼中學是澳門教育史上在職業技術教育方面影響最大的學校，被認為“在港澳地區開創印刷教育先鋒作用”，為港澳地區培養了大量印刷界人才，許多畢業生到香港工作，甚至後來香港理工學院的印刷系，也曾使用慈幼中學的印刷教材。¹²⁴

澳門很早就出現了專門教育，包括航海學校，後來的商業學校，甚至還出現過炮兵學校。這些學校對西方近代科學和專業技術的引入，做出了貢獻。澳門是東西方之間的航運中心，需要大量的領航員，而航海需要熟練掌握天體運行、幾何學、測量術和航程推算等知識，因此最早的專門學校就是航海類的學校。澳門最早航海學校的創辦始於1786年，1798年時任“葡印總督”正式批准設立澳門航海學校，為澳門青年開設專門的航海課程。¹²⁵ 及至1814年8月3日，葡萄牙攝政大臣下令創建“澳門皇家航海學校”。該校章程規定，“課程分兩年完成。第一年學習算術、代數、方程式、幾何級平面三角。第二年學習球面三角、天文學、地形測繪學、領航術、船隻的操縱、儀器的使用及實習。”¹²⁶ 由於澳門合格的生源太少，皇家航海學校並不太成功，1820年大約只有14名學生，三位教師執教，1823年關閉。1825年，澳門設有一間“船舶駕駛學校”。¹²⁷ 1862年，皇室下令在聖若瑟修院設立“航海課程”，以取代皇家航海學校，並頒佈《航海課程條例》；修院同時還附設商業課程。航海課程聘請海軍人士任教航海和數學課程，1863年11月20日正式開課，只收走讀生。但課程發展並不理想，據說到1883年只剩下一名學生。1906年，澳門總督下令再次創建航海學校，隸屬於港務局。基礎課程兩年完成，教授航海基礎知識，畢業後獲得“航海資格證書”。該校一直運作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¹²⁸

澳門是個商業社會，尤其鴉片戰爭以後隨着香港的崛起，澳門迫切需要加強商業人才的培養。1871年，“澳門土生教育促進協會”成立。1878年，該會正式開辦澳門商業學校（Instituto Comercial de Macau），講授商

澳門研究

業課程。1881年，聖若瑟修院改組，“附設商科”，商業學校與之合併，辦學很有成效。該課程為期三年，學習科目包括：實用英文以及英文商務信函、應用於商業的初級數學、速記及打字、商務地理、英文商業簿記、英文貿易實踐及商務技術、中國地理概念、現代歷史（明朝開始）、政治經濟及商業法概念、書法（包括商務中採用的公式圖形教學）。¹²⁹1901年，澳門總督高士德批准在利宵中學附設商業課程，1909年據記載有19人就讀。¹³⁰1919年，政府下令將附屬於利宵中學的商業課程分離，設立具有獨立校舍的“澳門商業學校”，先由民間辦理，後轉為公立學校。這是澳門第一家商業專科學校，培養了一大批人才，促進了現代商業和會計制度在澳門的發展。

另外，“醫務傳道”是十九世紀後基督教新教接觸華人民眾、實施傳教工作的重要途徑，而澳門是西方醫療知識和技術傳入中國的最早管道。事實上，在此之前，天主教進入澳門，就將西方的醫療書籍、技術和藥品帶到了中國。¹³¹聖保祿學院當時設有非常有名的醫務室和藥房，不僅擁有很多的醫療器械和製藥設備，還有專業的醫生和藥劑師。還有記載說，神父在學院進修的課程包括“初級醫藥”，有中國青年在學院學習“外科和放血療法”¹³²，因而在西醫東傳過程中發揮過一定作用。近代的基督教新教，則明確提出舉辦醫學教育。伯駕（Peter Parker）就提出要舉辦一個“學院”，學生從馬禮遜學校挑選。¹³³

4. 葡語教育及其傳播的尷尬

澳門在歷史上曾被稱為“語言的博物館”，這首先是因為在十八至十九世紀在澳門居住着十分多樣的族群，容易出現類似“巴比倫塔”的語言世界，而且與不同時期學校的教育有關。

西方語言在澳門的傳播，首先傳入的當然是葡萄牙語，因為最新進入澳門的是葡萄牙人。客觀地講，最早推動葡語在澳門及周邊地區傳播的因素應該是通商的需要，“十八世紀中葉

以前，葡萄牙語已成為中國南部口岸商業通用語”¹³⁴；另一個因素是通婚，有研究表明，“在十六世紀八十年代，澳門土生葡人與華人婦女結婚的現象已經出現，而且應不在少數”，“到十七世紀中葉，澳門城內的葡人通婚對象則以華人為主了。”¹³⁵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傳教的需要，由於保教權的關係，葡國以外西方其它國家的傳教士來到澳門前後也要學習葡萄牙語。

但是學校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耶穌會士抵達澳門後，很快就在澳門建立了培養兒童的讀寫學校，例如創始於1571年，而後又附屬於澳門聖保祿學院的讀寫學校，一直教授葡萄牙語。為了推廣葡語，澳門聖若瑟修院也經常舉辦一些用葡萄牙語來進行的表演及遊戲活動。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很早就意識到了傳播葡語的重要性，特別是對小孩進行的葡語教育。據記載，1822年在一次議事會召開的會議上，就有人建議：

創建兩所初級女子學校，教師們不僅要教授孩子們讀、寫、算數的規則，還應該教授他們葡萄牙語語法。……孩子們既可以當面學，還可以去歐洲進行實踐，因為這對於孩子們學習葡文和提高葡文水準來說是最佳的方式。¹³⁶

當然，葡語教育遇到了很多的挑戰。有葡籍人士在回顧澳門的葡語教育與推廣的過程時，不無傷感地說：“當回顧大約五個世紀前葡萄牙人在東方，特別是在澳門的事跡，我們可毫不猶疑地說，作為溝通及推廣文化的語言，葡語的地位已今非昔比。”¹³⁷其實，早在十八世紀末葉，首位從葡萄牙到澳門的皇室教師就抱怨，當地的葡國人學生完全忽視葡語：“只講一種變了質和不純正的葡語與漢語混合的方言”¹³⁸著名漢學家文第士則指出：“在澳門的學校中最費力不討好的課題就是葡文教育。”¹³⁹澳門政府1914年公佈了《公共教育改革委員會的報告》檢討說：“澳門幾乎處於被拋棄的境地，……人們講英語比講葡萄牙語更普遍，澳門的中產階級更熟悉莎士比亞的語言，而不

是卡蒙斯的語言。”其原因也被歸於“糟糕透頂的公共教育”¹⁴⁰

其實，葡語在澳門的傳播如果有成功或者成績的話，那要歸功於澳門的教育，尤其是始終伴隨着葡語教育的官立教育系統，以及葡人歷史以來在澳門天主教及其學校系統中的影響力，特別是這兩個系統重視葡文的課程傳統。如果要查找葡語推廣五百多年來在澳門所遭遇的尷尬的根源，那麼，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葡語從來沒有在中文學校的課程系統中佔有一個不可撼動的位置——哪怕是一個小小的角落。在歷史上，葡國治理時期的政府並非如許多人想像中那樣無所作為，只不過從未突破“以資助換課程”的策略；這個策略從十九世紀後期出現到今天，一直沒有在教育實踐上取得主政者們所期待的成果。這正是葡語無法在澳門普及的內在邏輯。

5. 英語的傳播及其文化後果

今天，英語在澳門有十分廣泛的影響，葡語也不斷地被強調。但不要忘記，拉丁語曾是“在澳門主要傳播的第二種西方語言”¹⁴¹。為培養傳教士的需要，澳門聖保祿學院和聖若瑟神學院都教授拉丁語，而且課時甚多。澳門供西方人最早學習中文的教材甚至有的以拉丁文編寫。¹⁴²

當然到後來，在澳門傳播最廣、時間最長、對澳門影響最大的西方語言是英語。英文的傳播當然首先要歸功於鴉片戰爭前後英美勢力在中國以至亞洲影響力的不斷擴大，它大大提升了社會各領域對英文的需求；而在文化交流機制上，還要歸功於馬禮遜 1823 年在澳門完成並出版了第一部完整的《華英字典》¹⁴³，既為西人學習中文提供了方便，也為華人學習英文創造了條件。

但是在馬禮遜時代，澳門學習英文的人數是很有限的，只有當英文被納入到學校課程，學習英文才有了普遍性，並透過課程的強制性

和系統性讓一代代人受益。所以，馬禮遜學校在澳門的創立對於英文的傳播而言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正是以馬禮遜學校為代表的基督教新教教育系統的引入，為英文及其文化在澳門和華南地區的傳播開闢了道路。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就提到布朗校長的報告：“馬禮遜教育會採用的教育計劃，彌補了中國教育系統所組成的每一個缺陷。我們為我們的學生打開了一個蘊藏在英語文化中的知識之源。”¹⁴⁴

當然，英語及其文化在澳門的傳播，更根本的還是要歸功於進入二十世紀後澳門公共教育系統對英文的重視，尤其是經改造後的教會學校在澳門教育系統中長期佔據主導地位，而它們在課程（外語）上又以英語為先，有的甚至以英語為教學語文。

6. 對現代體育的影響

如果深入追溯課程發展史，西方的學校課程起源於古希臘的“七藝”，即由文法、修辭和邏輯（或雄辯術）構成的“三藝”，以及由算術、幾何、天文學和音樂構成的“四藝”。與此同時，古希臘人對體育抱有堅定的信念。而近代體育的發展與宗教改革有關。在宗教改革前，基督教對體育長期持否定態度。新教產生後，一批教育改革者開始在學校嘗試開設體育課。天主教此時也將注意力轉向教育事業，開始在學校提倡體育，其中耶穌會的表現尤為突出。澳門現代體育的發展，有學者概括說：

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人進入澳門，帶來了中世紀後期“騎士體育”的餘風；十八世紀後期英國人定居澳門後，則又將紳士體育傳入澳門，並對澳門的近代體育產生影響；而到十九世紀後期，西方近代體育則得以在澳門學校教育中普遍傳播。¹⁴⁵

十六至十八世紀，澳門的“騎士體育”和“紳士體育”與學校教育沒有密切關聯，因為無論是聖保祿學院還是後來的聖若瑟修院，這

澳門研究

時都沒有正式的體育課程。雖然聖保祿學院的年報有記載說：“我們學院裡的所有人都在努力鍛煉身體，希望有一副強健的體魄”；學院還規定，星期天和其他休整日“所有人都應登山散心，呼吸新鮮空氣”。到十七世紀初，學院還開始開發青洲島，“為學院中的人和學生提供了進行體面娛樂活動的場所”；1828年，聖若瑟修院接管青洲，青洲成為師生游泳、划船、散步的場所。可見，此時“澳門的學校體育就是通過舞蹈、戲劇、散步、游泳、登山等活動方式來展開，這與當時歐洲剛剛興起的學校體育大致同步。”¹⁴⁶

澳門近現代體育的發展，則與西方近代學校體育課程的引入有關，教會學校和十九世紀末新式學校普遍開設體操等課程，是澳門近現代體育發展的動力。基督教學校重視體育，1841年10月《中國叢報》記載馬禮遜學校的情況說：“學習時間從早晨六時至晚上九時。如此，有八個小時用於讀書，三至四個小時用於室外鍛煉和娛樂”¹⁴⁷，學校還安排了專門的校舍作為運動場地。1900至1904年，嶺南大學的前身——1892年創辦於廣州的格致書院，為避免北方義和團的影響而遷往澳門辦學四年。該校“體育教師路易士創辦陸軍團演戲兵操，和當地中、葡人士舉行足球聯賽帶給社會新的氣息。其中啞鈴體操的表演更獲好評。”¹⁴⁸這些學校沒有正式的體育課程，但都重視學生的運動和鍛煉，可以說，在中國的體育教育史上，澳門的教會學校開啟了體育教育的先河。

最早正式引入西方體育的應該是十九世紀創辦的官立學校，除了前面已經提到的創辦於1878年的澳門商業學校和創辦於1893年的利宵中學外，1882年還設立了路環小學和氹仔小學，1883年設立的男子中心小學。¹⁴⁹當時，葡國的學校已設有體操課，澳門的這些官立學校應該也有跟隨。1906年2月8日，“澳門蒙學書塾”刊登於《華字日報》的廣告說：“盧雨川先生仍在澳門大廟腳蒙學書塾主席，並延劉希明先生教授體操，吳節薇先生教授算學、英文。”可見，當時的書塾也開始教授體操。¹⁵⁰

如前所述，同時期的鏡湖義學和華商學堂，也設有體育設施和體育課程。

1911年1月7日，澳門政府頒佈第15號諭令，決定以後每年1月31日國慶日時舉辦一次體育運動比賽，以促進澳門體育運動文化事業的發展。“這是澳門歷史上第一份關於發展體育運動的正式官方檔案，在澳門體育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為此專門設立的澳門運動會委員會亦成為澳門歷史上第一個由政府出面組織的對澳門體育進行監管的行政機構，標誌了澳門近代體育制度的初步建立。”¹⁵¹

1923年10月13日，澳門政府頒佈第51號法令——《體育局與運動場規章》¹⁵²，規定將青年學校體育運動場——塔石球場移交給澳門體育局，作為專門的“學校運動場（C.D.E.）”，並制定相應的必要規章進行規範引導。這是澳門政府第一份關於學校體育教育的正式檔案，該法令將體育作為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來予以支持和發展，其中章程第三款闡述了建“學校運動場”的目的是為在校青少年的體育教育，通過體操和競技運動，塑造健全體魄的民眾。

7. 對藝術的影響

學校課程對於澳門藝術的影響也是十分深入的。毫無疑問，天主教音樂是澳門音樂文化中最重要和最富有特色的部分。究其來源，與聖保祿學院和聖若瑟修院的音樂課程和相關的教育活動，有十分直接的關係。如前所述，附設於聖保祿學院的“讀寫學校”已有音樂教育，孩子們除了讀書、寫字外，還要協助做彌撒、唱歌。聖保祿學院則不僅設有音樂課，重大節日或考試的某些環節師生還有音樂或戲劇表演。“可見，室內樂演奏、合唱團、樂隊及其相應表演實踐，當時已於學院中存在”，“不僅在院內，亦在社會上產生極大影響，客觀地為以天主教文化為主的西樂東傳發揮了橋樑作用。”“在神父（教師）帶領下由學院的學生們組成的唱詩班和樂隊，則開啟了澳門天主教禮儀音樂的先聲。”¹⁵³有記載說，葡國耶

蘇會士中的著名音樂家、對康熙時期宮廷音樂影響甚大的徐日昇(Thomas Pereira, 1645-1708)，1672年抵達澳門後，即參與了聖保祿學院的音樂教學，為學生講授音樂知識。¹⁵⁴學院將音樂設為一門正式課程，而非僅將其作為點綴學校生活或者活躍學院氣氛的手段。

聖若瑟修院比聖保祿學院更加重視音樂教育，無論是大修院還是小修院，音樂都是所有學生的必修課。來自歐洲的優秀師資為澳門培養出眾多的音樂人才，學校還有學生樂隊。自十八世紀中期到十九世紀末，“聖若瑟修院是這時期澳門天主教音樂、尤其是天主教禮樂創作的最重要母體。”¹⁵⁵1814至1841年生活在澳門的葡籍優秀音樂家江沙維(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曾在聖若瑟修院教授音樂課，他還創作了許多天主教音樂和中國樂曲。1870年代，修院的音樂教師由來自法國的著名耶穌會音樂家羅迪納擔任，他甚至邀請當時意大利著名的作曲家來學院表演和講學；他還在學院組織了一支由30個男孩組成的樂隊。¹⁵⁶在同時期的其他學校，1839年開辦的馬禮遜學校，設有音樂課程；1848年澳門的聖羅撒學校也開設有音樂課，由當時的主教講授。¹⁵⁷

到二十世紀，澳門的天主教音樂達到一個歷史高點，聖若瑟修院在聖樂的傳承方面有極為顯著的作用。尤其劉雅覺神父任教修院四十餘年，對聖若瑟修院音樂課程貢獻良多，且曾為澳門中葡學校編寫教科書。1905年，他獲教區籌得的鉅款，購置銅管樂器，並訓練三十餘人組成銅管樂隊，親任指揮，活躍於各種節慶活動，前後三十餘年，澳門後來的許多音樂界知名人士皆為其門生。¹⁵⁸1931年從葡萄牙來澳門入讀該校的區師達神父，1962年參與創辦澳門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1983年參與創立澳門室樂團。¹⁵⁹林家駿主教曾回憶說：“至二十世紀，……修院中的愛好音樂風氣大盛。”¹⁶⁰他還說：“談到音樂，我們的修院是向負盛名的。除了聖則濟利亞歌詠團外，還有組織良好的管弦樂隊……”¹⁶¹但是，有評論認為，“嚴格來說，近代以後澳門的音樂教育反而不如天主教主導時期”¹⁶²，這的確是符合事實的。

明清時期學校教育對於澳門美術的影響，情況與音樂大不相同。概因中國傳統繪畫的開展與傳承均不在學校，而着重於文人之間；無論蒙學還是更高層次的官學，歷來均以識字、讀經為中心，繪畫被視為雕蟲小技。而西洋美術對於傳教而言，不像音樂那樣為所有信眾參加彌撒時所必需，因而流傳也就沒有那麼廣。所以從十六世紀中到十九世紀末，無論教會學校還是華人辦的教育機構，美術教育並不佔有重要地位。如前所述，耶穌會神父尼閣老在聖保祿學院創立的早期(1626年前)可能對學院的美術教育增添了光彩，但難說學院在十七世紀澳門天主教繪畫藝術的進步中有多麼顯著的貢獻。及至十九世紀上半期，儘管活躍於澳門的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在澳門帶出不少學生，如林呱(關喬昌)，甚至有研究說早在十六世紀末“澳門已出現了由傳教士畫家教習西洋美術的機構”¹⁶³，但畢竟這不是學校教育的主流。

總之，在藝術領域，學校課程影響較大可能是音樂，而且具有一定的連續性，但以西洋音樂為主。中國繪畫在明清時期從未進入澳門的學校課程，西洋美術因為某些著名畫家與某個教育機構的機緣巧合，而在其中發揮過某種作用，但偶然性很大。澳門學校規範化的美術教育在二十世紀以後才出現，並逐步普及，對視覺藝術的發展而言，這才具有真正的意義。

五、總結

澳門的中小學教育及其課程與澳門文化之間，歷史上一直互為包含、相互推動。明清時期澳門中小學“三軌並行”課程傳統的形成，對澳門文化有其深遠的影響。

所謂的“三軌”，一是指天主教和基督教學校的課程傳統，以聖保祿學院、聖若瑟修院和馬禮遜學堂為代表，是澳門課程傳統中最早、最有影響的一支。它重視宗教、拉丁文、葡文、中文和英文，同時引入科學、體育和藝術課程，對澳門文化的構成及其演化帶來重要影響。二

澳門研究

是華人教育的課程傳統。十九世紀末華人的蒙學教育及其課程，尤其是以陳子褒蒙學書塾為代表，推動了以蒙學教育為代表的傳統儒家教育向現代教育的轉型，隨着華人教育的擴大，奠定了澳門文化傳統的底色。三是葡文學校及官立學校的課程傳統。它形成於十九世紀中後期，以重視葡語課程和葡國文化為特點。

“三軌”課程來到澳門，時間先後有別，影響大小不一，但在十九世紀中晚期它們齊聚澳門，形成了澳門“三軌並行”的課程格局，交相輝映，共同構成澳門文化的不同扇面，也成為澳門文化血脈演化的重要動力。

附：本文為 2016 年澳門文化局學術研究獎學金項目《十九世紀以來澳門中小學課程變革與文化傳承研究》階段性成果。

註釋：

1. 陳志峰主編：《雙源惠澤，香遠益清——澳門教育史料展圖集》，前言，澳門：澳門中華教育會，2010 年。
2. 劉羨冰：《澳門歷史上雙語人材的培養與中外文化教育交流》，載《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 年，第 5 頁。
3. 1573 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門的租居權後，即以澳門港為基地，大力開闢澳門—果阿—里斯本、澳門—長崎、澳門—馬尼拉—墨西哥三條國際貿易航線，開展世界大循環的“大三角貿易”活動。參見鄭煒明、黃啟臣：《澳門宗教》，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 年，第 29 頁。
4. 基督教第一次傳入中國是 635 年（唐朝貞觀九年），由基督教聶斯脫里派（Nestorians）主教、敘利亞人阿本（Olopen）傳入新疆，唐朝人稱之為景教。第二次是 1294 年（元朝至元三十一年），由羅馬教廷聖方濟各會修士約翰·孟特·高維諾（John Mont Govvino）傳入中國。第三次是十六至十九世紀，分裂後的基督教三大教派中的天主教於 1552 年（明朝嘉靖三十一年）、東正教於 1689 年（清朝康熙二十八年）、基督教（新教）於 1807 年（清朝嘉慶十二年）傳入中國。鄭煒明、黃啟臣：《澳門宗教》，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 年，第 31 頁。
5. 夏泉：《明清基督教教會教育與粵港澳社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6-12 頁。
6. Liam Ma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Cambridge & London: The

-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11-213. 轉引自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 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869 頁。
7. 參見：澳門檔案館，檔號：MO/AH/EDU，題名“教育廳”，涵蓋日期：1871/09/02 - 1983/01/04，<http://www.archives.gov.mo/webas/ArchiveDetail.aspx?lang=C&archiveID=5613>。
 8. 參見 [法] 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22 頁。轉引自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 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871 頁。
 9. Manuel Teixeira, *Educação em Macau*,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1982, p.183.
 10. António Lopes, *Serviços Prestados Aos Moradores de Macau Pelo Colégio de Macau*, Missão de Macau, 21 de Abril de 1999. 轉引自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第 32 頁。
 11. 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 *Cartas Anuas do Colégio de Macau(1594-1627)*,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9, p.62. 轉引自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 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887 頁。
 12. 轉引自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第 16 頁。這些學生正因為自小參與這些活動，他們中的不少人後來成為早期入華傳教士的得力助手。
 13. 參見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 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885、887 頁。
 14.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 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886 頁。
 15. 轉引自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第 77 頁。
 16.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 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1093 頁。
 17. 聖保祿學院在 1601 年曾被焚毀，但隨即重建。關於聖保祿學院被關閉的時間，以往多以為是聖保祿教堂被焚毀的 1835 年。事實上早在 1760 年，葡國王就下令沒收耶穌會在全國各地的財產，包括教堂、學校和其他佈道場所；1762 年葡屬印度總督向當局傳達此命令，將耶穌會在澳門的全部財產充公並交予教區，其中包括聖保祿學院和聖若瑟神學院。同年 7 月 5 日澳葡當局查封了兩校，並逮捕了兩校的 24 名耶穌會士。故聖保祿學院的關閉時間是 1762 年，而非聖保祿教堂被焚毀的 1835 年。參見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第 37-48 頁。
 18.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 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887-890 頁。
 19. 黃啟臣：《澳門第一所大學：聖保祿學院》，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1994 年，總第 30 期，第 36 頁。

20. 劉羨冰：《澳門歷史上雙語人材的培養與中外文化教育交流》，載《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17-19頁。
21.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49-51頁。
22. 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 *Cartas Anuais do Colégio de Macau(1594-1627)*,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9, p.62. 轉引自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887頁。引文中提到的“藝術課程”（Curso de Artes），實際上並非今天所理解的音樂和美術等藝術課程，而是教養性的課程，為期三年，從考試的內容看，主要是邏輯學、自然哲學和經院哲學。參見：[葡] 多明戈斯·馬烏里西澳·戈麥斯·多斯·桑托斯（Domingos Mauricio Gomes dos Santos）著，孫成敖譯：《澳門：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澳門：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1994年，第48-51頁。
23.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892頁。
24. [葡] 多明戈斯·馬烏里西澳·戈麥斯·多斯·桑托斯著，孫成敖譯：《澳門：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澳門：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1994年，第46-53頁。
25. [葡] 多明戈斯·馬烏里西澳·戈麥斯·多斯·桑托斯著，孫成敖譯：《澳門：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澳門：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1994年，第53頁。
26.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890-891頁。
27. 阿奎維瓦致范禮安的信，羅馬，1587年12月28日，ARSI Jap-Sin3:13n。轉引自[美] 柏理安：《東方之旅：1579-1724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毛瑞方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6頁。
28. 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 *Cartas Anuais do Colégio de Macau(1594-1627)*,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9, p.218. 參見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822頁。
29. 據1604年1月27日《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的記載，當時就派了七個該學院的神父和修士前往中國內地。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 *Cartas Anuais do Colégio de Macau(1594-1627)*,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9, p.173.
30.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載故宮博物院編：《文獻叢編》第6輯，北京：民國十九年刊本。參見顏廣文、張海珊：《早期澳門的教會教育》，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71期，2009年。
31. 葉農：《澳門教育發展史新輝煌——澳門聖若瑟修院始末初探》，《文化雜誌》中文版，第71期，2009年。
32. [瑞典] 龍思泰著，吳義雄、郭德焱、沈正邦譯，章文欽校註：《早期澳門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51頁。
33. [瑞典] 龍思泰著，吳義雄、郭德焱、沈正邦譯，章文欽校註：《早期澳門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51頁。
34.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VIII, Padres de Diocese de Macau*, 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72, p.252-253. 轉引自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920頁。
35. 林家駿神父：《澳門聖若瑟修院簡史》，載《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一）》，澳門：澳門天主教教務行政處編製，出版年份不詳，未標頁碼；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922頁。
36. 此處的“葡文書院”應該就是“小修院”。據高天予神父回憶，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聖若瑟大修院”和“聖若瑟小修院”都是正式的名稱，“通常人們稱呼是聖若瑟大修院，其中包括了附屬的小修院。”參見呂志鵬、陳麗蓮編撰：《聖若瑟修院藏珍館》，澳門：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2016年，第201頁。
37. 呂志鵬、陳麗蓮編撰：《聖若瑟修院藏珍館》，澳門：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2016年，第52頁。
38. 陳麗蓮：《聖若瑟修院高天予神父訪問紀錄（節選）》，參見呂志鵬、陳麗蓮編撰：《聖若瑟修院藏珍館》，澳門：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2016年，第201-202頁。
39. [葡] 格得士（João Guedes）著，譚鵬鳴譯：《崔德祺——傳記中的歷史》，澳門：婆仔屋文創空間、藝竹有限公司，2017年，第115頁。
40. 呂志鵬、陳麗蓮編撰：《聖若瑟修院藏珍館》，澳門：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2016年，第68頁。
41. 呂志鵬、陳麗蓮編撰：《聖若瑟修院藏珍館》，澳門：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2016年，第60-66頁。
42. 據高天予神父回憶，在修院，葡國籍的學員要學習中文；而且“每晚晚飯後散心的時間，說話規定一晚講中文，一晚講葡文。講中文的晚上，葡國人都要講中文，不懂的就在旁邊聽，用這樣的方法來實習。”參見呂志鵬、陳麗蓮編撰：《聖若瑟修院藏珍館》，澳門：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2016年，第201-202頁。
43. 施白蒂著，姚京明譯：《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144頁。
44. 施白蒂著，姚京明譯：《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224頁。
45. 教育暨青年司：《澳門學校的特徵》（1992/1993），澳門：教育暨青年司，1994年，第174-175頁。
46. 1839年剛設立時僅一個班共六人，1840年入學的第二批學生共七人，1841年入學的有16人，1942年學校遷港時只有十人隨行；到1848年，據《馬禮遜教育會第十次年度報告》記載，除了由布朗校長帶往美國的容閱等三人外，全校學生共有27人。參見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51-65頁。

澳門研究

47. Circular of the Provisional Committee, in ABCFM Papers, 16.3.11. 轉引自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 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931 頁。
48. 參見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 年，第 60 頁。
49. 《馬禮遜教育會第六次年度報告》（1844 年），轉引自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第 224-225 頁。
50. 《馬禮遜教育會第六次年度報告》（1844 年），參見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第 234 頁。
51. 轉引自夏泉：《明清基督教教會教育與粵港澳社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207-208 頁。
52.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351-352 頁。
53.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352-353 頁；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 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934 頁。
54. 有葡籍學者稱，直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葡萄牙的自由主義革命之後，葡萄牙才開始建立其現代的政府架構，從而延續龐貝爾時期已經開始的公共教育網絡”。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Contributos Para a Sua História*,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9, p. 16.
55. 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Contributos Para a Sua História*,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9, p.58.
56. 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Contributos Para a Sua História*,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9, pp. 48-49.
57. 來源：澳門檔案館，檔號：MO/AH/EDU，題名“教育廳”，涵蓋日期：1871/09/02 - 1983/01/04，<http://www.archives.gov.mo/webas/ArchiveDetail.aspx?lang=C&archivelD=5613>。
58. 來源：澳門檔案館，檔號：MO/AH/EDU，題名“教育廳”，涵蓋日期：1871/09/02 - 1983/01/04，<http://www.archives.gov.mo/webas/ArchiveDetail.aspx?lang=C&archivelD=5613>。
59. 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Contributos Para a Sua História*,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9, p. 16.
60. 葉農：《兩次鴉片戰爭期間（1839-1861）的澳門》，澳門：澳門國際研究所，2013 年，第 285 頁。施白蒂著，姚京明譯：《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年，第 144 頁。
61. 施白蒂著，金國平譯：《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 1900-1949）》，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 年，第 49 頁。
62. 葉農：《兩次鴉片戰爭期間（1839-1861）的澳門》，澳門：澳門國際研究所，2013 年，第 282-283 頁、第 297 頁。
63. 根據澳門檔案館的檔案記載，該校的葡文名為“Nova Escola Macaense”，檔號：MO/AH/EDU，題名“教育廳”，參見：<http://www.archives.gov.mo/webas/ArchiveDetail.aspx?lang=C&archivelD=5613>。1861 年 4 月 27 日刊登於香港的英文報紙《華友西報》的該校章程，則將該校的英文名譯為“The New School Macaense”。這裡的“Macaense”都應指澳門的土生葡人，而非一般意義的“澳門人”。但施白蒂的相關記載被譯“澳門人”，因而此校亦被譯為“新澳門人學校”（參見施白蒂著，姚京明譯：《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年，第 144 頁）；可事實上，在施白蒂該書的葡文版中，該校的葡文名與澳門檔案館的記載一樣，是“Nova Escola Macaense”（Beatriz Basto da Silva,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Século XIX*,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5, p.189）。
64. 施白蒂著，姚京明譯：《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年，第 144 頁、146-147 頁。
65. 施白蒂著，姚京明譯：《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年，第 159 頁。
66. *The Friend of China*, April 2th, 1861, Vol.20, No.30(newseries), pp.358-359. 轉引自葉農：《兩次鴉片戰爭期間（1839-1861）的澳門》，澳門：澳門國際研究所，2013 年，第 231-232 頁。
67. *The Friend of China*, April 23rd, 1861, Vol.20, No.25(newseries), p. 302. 轉引自葉農：《兩次鴉片戰爭期間（1839-1861）的澳門》，澳門：澳門國際研究所，2013 年，第 262 頁。
68. 湯開建、吳志良、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877 頁。
69.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 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957-959 頁。
70. 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1982, p. 84-85.
71. 施白蒂著，金國平譯：《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 1900-1949）》，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 年，第 133-134 頁。
72. 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Contributos Para a Sua História*,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9, pp. 57-58.
73. António Aresta, Aureliano Barata, and Albina Santo Silva, *Lyceu de Macau: Genealogia de Uma Escola*,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6, pp. 11-12.
74. 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 Contributos Para a Sua História, Macau: Dire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9, p. 58.*
75. António Aresta, Aureliano Barata, and Albina Santo Silva, *Lyceu de Macau: Genealogia de Uma Escola*, Macau: Dire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6, pp. 18-23.
 76. 參見《澳門省政府施政報告》，1911年，附件10，第2-3頁。轉引自施白蒂著，金國平譯：《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1900-1949）》，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49頁。
 77. Manuel da Silva Mendes, *A Instrução Pública em Macau*,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6, p. 58.
 78.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15頁。
 79. 湯開建、吳志良、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18、2017頁。
 80. 馮漢樹：《澳門華僑教育》，台北：海外出版社，1960年，第10-14頁。
 81. 咩路·馬渣度（Álvaro de Melo Machado）：《施政報告》，澳門，1911年。轉引自施白蒂著，金國平譯：《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1900-1949）》，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48-49頁。
 82. 馮漢樹：《澳門華僑教育》，台北：海外出版社，1960年，第10-14頁。另見劉羨冰：《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誌》，澳門，2002年，第60-61頁。
 83. 此前的一年即1891年，澳門鏡湖醫院曾辦有一處義學性質的“惜字善社”，免費教貧童識字讀書。參見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8頁。
 84.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21頁。
 85. 麥高溫：《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66頁。轉引自張文、石鷗：《基於南陽公學〈蒙學課本〉不同版本的新認識》，長沙：《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16年第5期。
 86. 左松濤：《近代中國的私塾與學堂之爭》，北京：三聯書店，2017年，第170頁。
 87. 轉引自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近代基督新教傳教士在華社會文化和教育活動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頁。
 88. 據劉羨冰的研究，澳門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華人教育共有三次興辦“義學”的高潮，一次是維新運動前後，一次是抗日戰爭期間，第三次是上世紀五十年代。這對推動華人教育的普及和中華文化在澳門的傳承，均發揮了重要作用。參見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0-98頁。
 89. 參見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21-324頁。
 90. 夏泉、徐天舒：《陳子褒與清末民初澳門教育》，澳門：《澳門研究》第22期，2006年6月。
 91. 參見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19-320頁。
 92. 參見呂達：《課程史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2-164頁。
 93.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19頁。
 94. 陳志峰主編：《雙源惠澤，香遠益清——澳門教育史料展圖集》，澳門：澳門中華教育會，2010年版，第48頁。
 95. 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Contributos Para a Sua História*,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9, pp. 15-16.
 96. 葉農：《渡海重生：19世紀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221頁。
 97. 劉羨冰：《澳門歷史上雙語人材的培養與中外文化交流》，載《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5頁。
 98. 1493年5月3日及4日，教宗亞歷山大六世（1492-1503年在位）兩度發出敕令，平分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在歐洲以外的拓展勢力，1494年兩國簽署托德西拉斯條約（*The Treaty of Torfesillas*），以佛得角群島以西370里格（Leagues）南北經線為界，葡萄牙享有保教權。見黃正謙：《西學東漸之序章——明末清初耶穌會史新論》，香港：中華書局，2010年，第24-25頁。
 99. 董少新：《葡萄牙耶穌會士何大化在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7頁。
 100.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866頁。
 101. 吳志良：《澳門歷史雙軌單行——兼評施白蒂〈澳門編年史〉》，載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第66頁。吳志良：《從澳門看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交融》，載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第1-13頁。
 102.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8-31頁。
 103. 參見東方葡萄牙學會董事會董事 Ana Paula Paiva Dias（杜愛寧）和 Rui Manuel de Sousa Rocha（羅世賢）為廖子馨小說《奧戈的幻覺世界》中葡雙語版寫的“前言”，載廖子馨：《奧戈的幻覺世界》，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2010年，第9頁。
 104.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上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580、688頁。
 105.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上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590頁。
 106. 參見 [葡] 羅理路著，陳用儀譯：《澳門尋根》，附錄文獻

澳門研究

- 12.《葛列格里奧·龔薩雷斯神父給胡安·德·波爾哈的信》，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1997年，第140頁。
- 107.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上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591-595、609頁。
- 108.吳志良、鄭德華主編：《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澳門卷），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98-199頁。
- 109.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18頁。
- 110.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19、338頁。
- 111.[法] 傅爾蒙 (Stephanus Fourmont) 著：《中國官話》（拉丁文名：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出版社：Lutetiae Parisiorum：Chez Hippolyte-Louis Guerin，1742年。現存於聖若瑟書院。
- 112.夏雪：《澳門現存早期對外漢語教材述評》，載董月凱、黃國豪、蔣美賢主編：《語壇探新錄——鄧景濱教授筆耕五十年紀念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原載《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1年10月總第5期。
- 113.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21頁。
- 114.《華字日報》1909年10月13日。參見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229頁。
- 115.《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參見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31頁。
- 116.王建平、王建軍：《清末民初澳門華人教育的興起》，廣州：《華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
- 117.狄震晨：《新教傳教士事業與近代白話語言運動》，《文化雜誌》（中文版），第98期，2016年。
- 118.參見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第五章“澳門的西方科學技術”，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714-865頁。湯開建：《被遺忘的“工業起飛”——澳門工業發展史稿：1557-1941》，澳門：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2014年。
- 119.蘇精：《鑄以待刻：十九世紀中文印刷變局》，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前言”第1頁。
- 120.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822-823頁。
- 121.蘇精：《鑄以待刻：十九世紀中文印刷變局》，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10、40頁。
- 122.陳樹榮等：《澳門百年印務》，澳門：澳門印刷業商會，2013年，第56頁。
- 123.陳樹榮等：《澳門百年印務》，澳門：澳門印刷業商會，2013年，第66頁。
- 124.陳樹榮等：《澳門百年印務》，澳門：澳門印刷業商會，2013年，第66頁。
- 125.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950頁。
- 126.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1982, p.25.
- 127.[葡]潘日明著，蘇勤譯：《殊途同歸：澳門文化交融》，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154頁。
- 128.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1982, p.32-35.
- 129.*Docu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a Educação em Macau, I.º Volume*,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1996, p.69.
- 130.[葡]潘日明著，蘇勤譯：《殊途同歸：澳門文化交融》，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181-182頁。
- 131.詳情請參見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046-1091頁。
- 132.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985頁。
- 133.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13頁。
- 134.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093頁。
- 135.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096頁。
- 136.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104頁。
- 137.António Aresta：《澳門的政權及葡語狀況（1770-1968）》，澳門：《行政》雜誌，總第27期，1995年第1期。
- 138.文德泉神父編：《澳門及帝汶省報告》，第38期，1877年9月22日，“十九世紀澳門傑出人士”。轉引自 António Aresta：《澳門的政權及葡語狀況（1770-1968）》，澳門：《行政》雜誌，總第27期，1995年第1期。
- 139.Manuel da Silva Mendes, *A Instrução Pública em Macau*,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6, PP. 89-90.
- 140.*Docu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e Educação em Macau, I.º Volume*,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6, PP. 75-76. 另見：António Aresta：《曼努埃爾·特謝拉神父與澳門教育史》，澳門：《行政》雜誌第11卷，總第40期，1998年，第551-552頁。值得注意的是，此處被譯為“曼努埃爾·特謝拉”的神父，即是在澳門廣為人知的文德泉 (Manuel Teixeira) 神父。
- 141.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093頁。

142. 夏雪：《澳門現存早期對外漢語教材述評》，載董月凱、黃國豪、蔣美賢主編：《語壇探新錄——鄧景濱教授筆耕五十年紀念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原載《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1年10月總第5期。
143. 張坤：《歲月留痕——東方基金會會址與基督教墳場》，澳門：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2018年，第145頁。
144. Chinese Repository, Vol.11, 第541-557頁；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頁。
145.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305-1306頁。
146.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280頁。
147. Chinese Repository, Vol.10, 1841/10, p.569.
148. 鍾榮光：《嶺南大學收回之經過》，轉引自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0頁。
149. 施白蒂著，姚京明譯：《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226-229頁。
150. 《澳門蒙學書塾廣告》，《華字日報》1906年2月8日。參見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213頁。
151. 《澳門政府憲報》1911年1月7日第1號。另見湯開建、吳志良、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93頁。
152. 《澳門政府憲報》1924年3月1日第9號。另見湯開建、吳志良、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五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99頁。
153. 戴定澄：《二十世紀澳門天主教音樂——獨特歷史背景下的作曲家與作品》，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3年，第15、17頁。
154. 參見卡瓦洛（José Vaz de Carvalho）神父1687年4月5日的信，轉引自[葡]若埃爾·加良著，斐斯譯：《徐日昇：十七世紀在中國皇宮的葡萄牙樂師》，《文化雜誌》（中文版），第4期，1988年，第45頁註5。又見戴定澄主編：《澳門高等音樂教育學科展望》，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7-8頁。
155. 戴定澄：《二十世紀澳門天主教音樂——獨特歷史背景下的作曲家與作品》，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3年，第21頁。
156.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253、1263頁。
157. [葡]潘日明著，蘇勤譯：《殊途同歸：澳門文化交融》，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155頁。
158. 林家駿：《澳門第一座華人堂區》，載林家駿：《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澳門：澳門主教公署“澳門天主教教務行政處”，1982年，第77頁。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263頁。
159. 呂志鵬、陳麗蓮編撰：《聖若瑟修院藏珍館》，澳門：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2016年，第60-66頁。
160. 林家駿主教：《晨曦聖歌選集》，澳門：澳門主教公署，1978年。
161. 澳門主教公署：《現在和過去的聖若瑟修院》，載澳門：《晨曦月刊》，澳門主教公署，1958年，第4卷，第2期，第12-13頁。
162.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254頁。
163. 潘耀昌：《中國近現代美術教育史》，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年，第11頁。

